

訪談與口述史

范振國先生訪問紀錄*

張宗坤**訪問

張宗坤、史學敏***紀錄

Interview of Mr. Fan Chen Kuo

Interviewed by Zackary Zong Kun CHANG

Edited by Zackary Zong Kun CHANG & Hsueh Min SHIH

* 訪談者按：訪談者要特別感謝蔡明德的引介，以及范綱增提供《鄉情》雜誌復刻版（包含1986年8月至1987年5月號，共十期，2016年10月12日由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復刻）供訪談者參考利用；亦要感謝葉馨云陪同第一次的訪談，史學敏在文章編輯上的協力，以及陳信行、鄭亘良的細心校對、補充。本項訪談獲得文化部「推動國家文化記憶庫補助－戰後台灣客家工人的勞動經驗與族群文化：以遠東化纖新埔廠為例」支持。

** 服務單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Doctoral Program,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Yangming-Chiaotung University)

通訊地址：300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陽明交通大學人社二館212室

E-mail: senran13@gmail.com

*** 服務單位：草聲工作室(Cao Sheng Studio)創辦人

通訊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群賢里和平東路三段49號3樓之4

E-mail: s936142@hotmail.com

訪談時間：

- (一) 2020年7月21日下午3時至5時
- (二) 2020年7月29日下午2時至5時
- (三) 2020年8月31日下午4時半至6時半
- (四) 2023年1月13日下午1時至2時半
- (五) 2023年3月17日下午2時至3時半
- (六) 2025年3月25日上午10時至12時

訪談地點：桃園范宅(桃園楊梅)

范振國先生，1957年出生於桃園埔心。1973年秋天因盜匪罪入獄，於獄中學習有成，1978年考入中興大學中文系。就讀中文系期間受業於作家林雙不，對寫實文學心生嚮往。1982年大學畢業後，陸續任教於明道中學、新民商工，期間受學長鍾喬介紹，1986年3月起赴鹿港投身反杜邦運動，深獲啟蒙。同年年底應作家陳映真之邀，擔任《人間》執行編輯。1987年年底開始協助工黨組黨，並於工黨正式成立後，擔任該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總幹事。是次訪談邀請范振國先生回首少年的輕狂、青年的悔悟，暢談直至八零年代間，與陳映真先生及《人間》同仁並肩同行，穿梭於反三晃、反杜邦、反李長榮與遠東化纖罷工等社運現場的組織和行動。

「青年太保」

1957年，我就在現在訪談的這間房子裡出生、成長，我現在幾歲，這個房子就有幾年。我父親是新竹人，我們出自湖口的范家，¹祠

1 湖口范姓分佈頗廣，經數代傳承後，多已廣散於桃竹苗區域，甚至向海外生根發展。若對照范光雲、范振國之字輩順序觀察，其家族應屬黃護稟系，范光雲為第十八世、范振國為第二十世。見吳文審(2007：59-63)、台北市范氏宗親會(2012)、新

堂跟老家也在那邊，他以前還常常騎摩托車帶我們回去。我們家以前是務農的農戶，家裡還有養牛，我小時候還跟祖父們下過田，在湖口算是地主家庭了。據父親講，以前湖口有整片土地都是我們家的，後來因為父親的祖父吸食鴉片，把整個田地敗得差不多，又碰到三七五減租這些國民政府來台以後的政策，土地雖然因此稀釋了，不過還保留了蠻大一片。

父親以前是新豐鄉公所低層的村幹事。他很早就介入了地方選舉，大概對地方人脈、怎麼操縱選票算是嫺熟。以前的新竹縣長范振宗也是我們宗族裡的人，我父親曾經協助過他競選縣議員。²我對父親的印象很模糊，幾乎沒什麼談話。記得我小六或國一時，有一次看到父親自己坐在我們現在講話的地方，很暗，他一個人在喝酒，講了一句我聽不懂的話，只記得他提到「二二八」三個字。可能是因為我祖父是二二八的受難人，叫做范光雲。

我對父親的印象比較淡薄，而且他比較早過世。因為客家人父權很重，重男輕女，父親很少跟子女講什麼，或跟我們有什麼互動。父親曾經失業過，鄉公所的工作也不是正式的公務人員，可能是透過一定的地方關係，像是當鄉長或是當課長的朋友讓他去，一旦政治上失位，他就沒工作。我父親常喝酒，他有一段時間很頹喪，喝醉酒後夫妻劇烈爭吵，家裡非常灰暗。

我大概因為排行最小，跟父親的關係比較好一點，可是印象也很淡泊，甚至有些負面，就是喝醉酒的父親。念大學以後就比較不一樣，當然也因為我們經濟上好轉了，開始有一點點認識甚至跟父親親近。大概在他五十歲左右，因為喝了劣質的酒，父親開始長期地生肝病。父親有時跑去酒家，酒女也來家裡要帳，這是那時男人普遍的情

竹范氏宗親會(2013)。

2 據新竹縣議會官網記載，范振宗係於1977年12月起至1982年7月止，擔任第九、十屆新竹縣議會縣議員。

況，母親就是接受，對父親大概也會有敵意。這樣一來我就會跟母親特別地親，覺得她一直受父親的壓迫。父親後來生病，當然就無能為力，都是我媽在照顧他。我現在六十多歲，大概在我這個年紀，我父親就過世了，家裡都是母親在撐著。

我母親是平鎮這邊的人，她是1927年出生，比我大三十歲。我父親是講海陸的客家人，我媽媽講的是饒平客家話。母親在日據時期念高商，後來進鐵路局當售票員，她可能是在日據時期考試進去的；我父親在日據時期讀公學校，讀漢書，學歷不算太高。我外祖母是文盲，外祖父去南洋做種植園的香蕉生意，聽我們那些表弟講，日據時期也算是大戶人家，非常有錢。光復以後日幣貶值，外祖父整床的日幣，變得好像冥紙一樣，家道整個中落。我很少聽我母親講外祖父的事，外祖父後來好像在南洋得病死掉了。

二二八的時候，我母親真的看過街頭上的暴力。我之所以知道祖父是二二八受難者，是我母親說祖父失蹤幾天，找不到他，不知道被人家帶到哪裡。母親那時在桃園火車站當售票員，她很巧地聽到有人在講，好像抓了一個什麼人，又講到我祖父的名字，打聽後才知道他在桃園某一個地方，才把我祖父救回來。

父母具體結婚的年紀我不知道，我大姐是1949年出生，推算大概是1947年，在我母親十九、二十歲時候結婚。我父母親是媒妁之言認識的，也算是門當戶對。父親是長子，很早就搬出來，我父親五兄弟中，其他四兄弟跟我祖父住，我們跟祖父那一邊的關係就疏遠了。我父母親自己獨立，在這邊買房子，我們是普通窮困的家庭。我父親通常都講日語，他們不想讓子女知道的話，就會講日語。我母親是客家人，是識字的職業婦女，在社會上算是高人一等，我們鄰居的婦女大部分不認識字，所以我母親對鄰里有一點鄙視的味道，相處其實不那麼融洽，這樣來看，我們家到底還算是比較有社會地位的。

因為家裡窮困，而且我們有五個兄弟姊妹，我媽媽都要養豬。我們家裡後面都是豬圈，養豬要大火大灶煮豬菜(zhu\ coi\)，³就是現在的蕃薯葉，還有養雞鴨來貼補家庭。家裡很少有收入或積蓄，都是靠賒債過日，像雜貨店、米店，小時候都是賒借的。我出生的時候，就是台灣社會開始要加工出口，經濟開始在發展，所以我貧困的記憶比較短。

我大姊那時在台中念私立的嶺東商專，⁴因為沒錢，根本沒有辦法唸書，我媽媽就去借錢讓我大姊讀書。我二姊很早就失學了，初中以後她就去公路局考車掌小姐，要吹哨子跟驗票。我哥哥是長子，父親比較期待，他以前也會唸書，但唸到師大附中就沒唸了，他不去考試，就在外面瞎混，退伍後去唸了台北工專的夜補校。我最小的姊姊唸的是淡江大學，有受到比較完整的教育。一般人講客家人重視教育，其實我想哪一個人不重視教育，就看你有沒有能力、願不願意。我姊姊想唸，是我二姊犧牲了他自己，唸完中學就去工作，家裡很大的補貼其實來自於我二姊。

一直到讀中學的時候我都在埔心。我的小學同學除了幾個外省人，可能因為父親是軍官級的，他們才有鞋穿，其他像我們全部都是打赤腳。國中我才有像中國強的球鞋，一直要我專科的時候，才有皮鞋可以穿。我高中時去唸新埔工專，⁵因為在外面瞎混，唸了一年就被退學了，後來有一段時間就不在這個社會上了——最開始是跟國中的同伴混小太保、拉幫結派，當然就沒有再唸書，對師長也沒什麼印

3 訪談者按：本文所有客語拼音係參考教育部臺灣客家常用詞辭典的「海陸音」條目。

4 即今日之嶺東科技大學，該校於1967年由嶺東會計專科學校改名為嶺東商業專科學校。見嶺東科技大學數位校史館(2021)。

5 即新埔工業專科學校，為今日之聖約翰科技大學前身。該校係於1967年在台降格復辦，1993年更名為新埔工商專科學校，1999年改制為新埔技術學院，1993年更名為聖約翰技術學院，並於2005年更名為聖約翰科技大學。見聖約翰科技大學校史室(無日期)。

象。所謂的幫派，就是大家混在一起，像創黨一樣取個名字。隨著你的成長，大家有這樣的因緣，就成為某一個集團裡頭的一員。我年輕時就是這樣，有一段「不在社會的時間」。其實早在國中二、三年級，心就已經沒有在學業上，整天在瞎混。

我的母親是職業婦女，去鐵路局上班常常要三天兩夜，回來就忙家事，大概都不大知道小孩子的變化。我被新埔退學的時候，學業沒什麼問題，但操行好像是戊等。如果家裡有一點點社會關係，只要去跟教官講，其實也不會被退學，但是我們沒辦法。母親帶著我還有大姊去，被訓了一頓，也不知道怎麼辯解，我就被退學了。退學不能讓我父親知道，我媽幫我安排每天去台北的建國補習班補習，⁶就住在台北。我父親到死都不知道我高中曾退學，後來我就出事情了。我出事時父親也很訝異，因為是在我們這邊出的事情，警察就找上我們。我很年輕時就戴眼鏡，那時很少近視眼，我又標新立異，繼續穿紅白兩截的新埔工專的班服，很容易辨認。

「不在社會上」

我是在高中一年級出事的，記得那天穿著一件夾克，應該是1973年的秋天。被帶走前，我好像還隨手拿了一本考前大猜題。法條上來看，事情其實沒那麼嚴重，就是兩邊年輕人打架而已，警政人員蓄意編造一個大案子，以便得到獎賞，從這可以看出他們的惡劣。

那時也不是意思清楚地為了地盤、為了保護費，我們就是囂張，大家彼此看不順眼。國中二年級一起混的、比較早熟的同學，他有男女的情慾，雖然我們那時候還不懂，但他們就有了。他們翹課跑去妓

6 建國補習班於1953年5月立案，係由湖南大學教授鍾元瑜創辦於台北車站周邊，後遷至館前路。唯該班在七零年代初期因鍾元瑜赴美而開始衰退。見丁時達（2005：64-66，76）。

女戶，在以前駐軍的高山頂那邊，⁷就是上面的仁美國中。⁸我們這群小孩子不懂事，根本沒有倫理分寸、江湖規矩。我們的罪名叫盜匪罪，嚴格講就是械鬥，我們把妓女戶砸了，殺了他們的老鴿，但也沒真的殺死，那個老芋仔(lāu-ōo-á)⁹的老鴿後來也被抓去關。以現在來講，我們真的是冤枉得不得了。

那次是兩邊的人械鬥，鬧得很大，警察就來找人。那邊妓女戶的老闆對我特別感冒，不只描繪我的外表，還找上我們這邊年紀比我大一點的，威脅他說，如果不把我交出去，還要把他也送去。算是這個人出賣了我，他帶著警察來我家，我就從我家被帶走。我父親愣在那邊，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母親完全不知道我在外面搞什麼鬼。她回來的時候就忙著家事，我雖然很晚回來，但很少躑家，我只是沒去學校，畢竟那時候也沒有在外面租房子的能力。偶爾晚上沒有回家睡覺，了不起就是跑到學校跟幾個同學瞎混，或是看威廉少棒，¹⁰沒有特別娛樂的地方，再怎麼樣你都要回家睡覺。那時候算是有點學生太保的樣子，但不像那些做工的，我們自認為是讀書的，還有一點點知識。

那時老鴿常常拿錢給我們，我們就是一群小鬼，他看到我們就說，「小兄弟，給你兩百、三百。」你就覺得很受禮遇，都很囂張。而且他們欺負人家妓女，我們認為這是在替天行道。後來不知道是哪一

7 高山頂，位於楊梅鎮東北角，涵蓋今日高榮里、高山里部分區域。該地原為土牛溝界外之原住民居住地，戰後除有幼獅工業區的開發建設外，1954年亦曾興建義士村，收容約六千名、占半數之韓戰反共義士。義士村結束後，又改建為陸軍營區。見楊梅鎮志編纂小組編(1990：37-38，281)。

8 仁美國中，前身為1964年設立之楊梅中學埔心分部，1967年升格。見楊梅鎮志編纂小組編(1990：253)。

9 訪談者按：本文所有閩南語正字與拼音，係參考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輸入。

10 即由世界少棒聯盟(Little League Baseball, LLB)舉辦的威廉波特少棒賽(Williamsport)，自1969年起，因為金龍少棒隊奪得冠軍，並在1969至1980年間因七虎、巨人、立德、榮工等台灣隊伍打入甚至奪得歷次比賽的冠軍而大受矚目，也造成熬夜觀賞跨國球賽轉播的全國熱潮。見謝仕淵(2017：204-213，220-225)。

個事情，還是哪一種利益上的衝突，他找了另外的人來找我們，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人家有準備，就先吃了虧。當然你就要復仇，就開始追逐。

聽說跟我們一起去的人有好幾批，月黑風高，大家「出兵」好幾次。有次我聽另一方在筆錄的時候說，我們把他們的鎖櫃撬開、房子砸爛，裡面有多少錢被我們拿走，我們就變成結夥強盜。盜匪罪在戒嚴時期是唯一死刑，我們是用軍法判刑。實際上的過程不是這樣，但他就非要用成這樣，我們還牽連出很多人，光是小太保打架的事情，就可以羅織成這個樣子。當時也有司法黃牛經常來講，要你拿多少錢來。我的同伴裡只有一個倖免無罪，但他家裡花了大錢。

以現在來說，如果你跟警察有衝突，被抓起來帶到警察局去，他們二十四小時之內要送到地檢署去起訴。但戒嚴時期有違警罰法，它規定你要是隨身攜帶槍械，可以先拘留七天到兩個禮拜，¹¹這七天會天天刑求、天天打，把所有可能牽連到的人全部牽進來，每一個人都找來。我很多的少年玩伴可能跟我們出去行動一次，沒找到人就回家了，結果就被羅織成我們的強盜集團。

我是其中的主謀之一，就是跟人家衝突的當事人。我們三五個，很多在旁吆喝的朋友被羅織、被送到警察局，先拘留七、八天，把你刑得差不多，再送到看守所。看守所又先讓你至少一、兩個月內禁止接見，然後再偵查。偵查完開放你跟家裡人接觸，才會有律師來。那個時候的司法根本很黑暗，沒有經歷過，不大能夠理解，現在這方面真的是有很大的進步。我們這種刑事案件就如此，你可以想像思想犯的情形更是嚴格。在看守所時有一個人，他教了我們很多。像教我們

11 見1954年10月12日修正之違警罰法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主刑之種類如左：一、拘留：四小時以上七日以下，遇有依法加重時，合計不得逾十四日。」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七日以下拘留或五十圓以下罰鍰：……七、未經官署許可，無故攜帶兇器者。」

唱歌，吹《桂河大橋》的口哨。¹²記得早上我們要升旗時，他講「紅旗要升起來了」。他其實很挑釁，跟我們講有所謂的思想犯存在。但他不是政治犯，是真正的流氓。

1973年我出事情，1974年進入訴訟程序。我們這種大的案子要經過三審，還沒定讞以前不會送監獄。地方法院判完，上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完，上最高法院，再一個非常上訴。我犯了這個唯一死刑的案，但是因為我未成年又沒有前科，所以第一審判七年半；我再上訴高等法院，減刑變成七年，最高的時候駁回、定讞，然後就移送。桃園判刑後我要上訴，上訴到台北高等法院，所以要移到台北的愛國東路。土城觀護所興建後，¹³一部分的人要移到那邊，我們那個時候是少年，我就從台北遷到土城。

我對蔣介石過世那天還有印象。1975年那天的早上真的是天地異象、飛沙走石，我們在舍房裡看到司令台那狂風暴雨，想說怎麼會這樣，整個舍房突然一陣肅殺。大家心裡想，老蔣掛了，大家一定減刑了。但因為我們是軍法審判、唯一死刑，沒辦法減刑。¹⁴一起混的人，門一打開他們就走了，我們卻不知道何年何月，還在打官司，心情是真失落。

12 《桂河大橋》(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係由大衛·連恩(David Lean)導演、亞歷·堅尼斯(Alec Guinness)主演，於1957年出品之二戰戰爭片。經查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之舊版報紙資訊，該片自1958年10月起在台上映，並陸續於1965、1969及1970年多次重新上映。該片主題曲即是以口哨演奏的《布基上校進行曲》(Colonel Bogey March)。

13 土城觀護所，即今日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係於1971年成立。1974年，因受輔導少年日增，開始陸續遷建至土城，並於1978年4月30日正式搬遷。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2018)。

14 見中華民國六十四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三條第三款：「左列各罪，不予減刑：……三、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及陸海空軍刑法第八十四條之罪。」

浪子回頭

1975年底、76年初官司定讞，我就到新竹監獄「唸高中」。我是取得高中的同等學力，那是蔣經國的德政「監獄學校化」：¹⁵每一個監所都有開設補校，通過檢定考就可以取得同等學力。三年後，我從那邊考上大學，在裡頭待了將近四年的時間。監獄行刑法關於刑事犯罪的規定是，少年犯服刑判刑的三分之一，就符合申報假釋的條件。¹⁶比如你判七年，服刑三分之一就是兩年多一點，就可以向司法行政部呈報假釋，那時候的部長叫李元簇。¹⁷我國中雖然是升學班，但不愛唸書，那些放牛班的兄弟對我比較好一點，是因為我會唸書，畢竟還是有一點底子。

監獄裡頭沒什麼事好幹，剛開始要下工廠，沒有學校就是做工，你就不可能有機會去考大學。記得我們在桃園的時候，就是做聖誕燈。到新竹監獄的時候，我被分到第八工場，工作就是把電池用包裝紙包起來，不知道捲了多少，媽的煩死了。做不好當然就會受處罰，不會是身體上的損害，我們沒有受到那種待遇，但他就會給你表現不良。

後來因為有學生隊，碰到這種挫折、學業中斷以後，我又有一個地方可以讀書。父親當里幹事時認得的朋友在監獄當教誨師，我父親跟他打了招呼，很快我就到了學生隊。學生隊當然比做工輕鬆多了，也不是不能唸書，但監獄根本還是監獄，不是學校，你就坐著不要亂鬧，每天軍事訓練做操。

15 1964年，新竹少年監獄經教育部核准設立受刑人學力甄試教育班，後又於1973年改制為新竹縣私立勵德補習學校，其中亦設有包含較多教誨時數之高中學分教育。見新竹監獄編纂(2013：18)。

16 見1971年4月30日全文修正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少年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七年後，有期徒刑逾執行期三分之一後，得予假釋。」

17 李元簇於1978年6月1日至1984年6月1日間任司法行政部(今日法務部前身)部長。見法務部(2019)。

偶爾有老師進來教一些基本的功課，但全班同學都不在唸書，是來混日子的。很少人像我有目標，我想說反正至少要待三、四年，乾脆每天設個計畫，準備考大學，日子很快就過去了。不像外面的教育，每個禮拜有固定的課表，我就自己排，比如我這個禮拜先把國文六冊讀完。我在那邊學習，哪有老師要認真教你？頂多你自己唸書，私下可以問他。這些老師來了，還會給我們帶私信。我們寫信要被檢查，進來或出去的信都要檢查。老師可能是被某個政府單位或學校派來，可能有一點補貼，考績會好一點。同學說是來上課，根本是在鬼扯，哪有人要聽課？就跟老師講社會事，老師在外面學生都教不起來了，還教這些。我們同期裡頭有一個基隆中學的，把他們老師給殺了。¹⁸他要一位老師帶菸，老師不要，他就在黑板上畫一隻斧頭。

大學社團對我們的幫助很大。像我對輔仁大學印象很深，很感念他們。那時有個叫做輔大醒新社的社團，組了專門到監所的勵德服務隊，¹⁹負責輔導我們，他們來就帶我們做團康活動。大學女生唱歌，男生跟你講一些大學的生活，心靈上是蠻大的享樂。另一個就是清華大學或交通大學，離我們很近，他們也有這種進來課輔的服務。有一個人是我隔壁鄰居，也是以前升學班的學長，他念交通大學，報名參加了志工隊，可以問他一些數學、英文。學生進來輔導，不用被檢查身體，就可以帶很多煙、錢之類的違禁品。

18 指周振隆案。該案發生於1969年5月，據報載，係因周振隆不滿導師江新同長期歧視對待，遂攜帶斧頭於早自修時砍殺之。該名學生後遭判刑十五年，最初分發至新竹少年監獄，後再移監至台中監獄服刑。1976年假釋出獄後，再以同等學力考入台北醫學院藥學系。見中央日報(1969年5月8日)、中央日報(1969年5月27日)、謝孟穎(2019)。

19 輔大醒新社係由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成立於1969年，七零至八零年代間陸續成立各服務隊，包含：1972年的港安山地友團、1973年的勵德新竹少年監獄服務隊、1973年的樂生麻風病療養院服務隊、1974年的愛盲重建院服務隊、1974年的愛愛服務隊、1976年的敬業勞工服務隊、1981年的報導攝影小組等，見淡淡的深藍(2003)。

我是聯招前的一個禮拜假釋回家的，6月20幾號回來，7月1號就考大專聯考。我最差的、還沒讀完的書，就是假釋前最後七天要讀的地理教科書，讀不到一兩次我就回來，回來也根本就沒有心情唸書，所以地理根本考不到幾十分。在裡頭過日子，我那些兄弟都很照顧，他們說「你要唸大學，好好唸啊」。有很多雜事，他們都不會讓我管，我很感念那種情誼，反正你就唸書就是了。

我本來想說考完大學才回來，結果它卻提前放我出來。監獄裡有模擬測驗，一考他們覺得我可能可以上大學，大概機率很高。一般人家在呈報假釋的時候，都是呈報了就期盼等待，我完全沒有那種期待假釋的心，我想考完大學再說。突然有一天就有人對我說，「范某某，打包，假釋了！」我站在教室門口，愣在那邊，沒有喜悅。旁邊一堆人很高興，就開始幫我收拾東西。

監獄裡面一般不能用現金，它給你錢卡，花多少錢就登記扣掉。出來之前，兄弟們弄了一捲現金給我。現金有現金的好處，因為現金很少、很珍貴，一定要有管道才有。從監獄走出來，我們不知道新竹市長怎樣，我們就是送來送去直接送到監獄裡，怎麼搭車我也不懂，家裡人也不知道，只好叫個計程車。那時候如果沒有錢也搭不了車，幸好這些裡面的人塞了一筆錢給我。

我搭計程車去到新竹火車站，背著一個大包包，先在火車站碰到一些朋友，再回到埔心火車站。街上的一些人看到我一個大光頭背著行軍的帆布袋，就說我回來了，到家我看到父親坐在那邊，他看到我就愣在那邊。第一天回來暈頭轉向的，生活作息完全不同，第二天這些朋友找我去吃飯喝酒，幾天後就考試了。我在交通大學考試，跟另一個假釋的夥伴兩個人理著大光頭在考，只是他沒考上。都是監所幫忙我們報名聯考的，填志願怎麼填我也不知道。

因為坐牢，我跟人的相處、對邊緣的人有完全不一樣的看法，王拓當立委的時候，新竹監獄發生暴動，暴動之後就要移監。²⁰那時小蔡（按：指蔡建仁）還在《立報》，我就去協助王拓調查這個事情，在立法院做公聽會，也在《立報》上寫了一大篇。我們自己經驗過就知道，很多情況不是一般人認為的，會對他們有比較多的理解，跟人家相處會多一個關照的角度。對生命的血氣、沒有那麼多算計的生命會比較親近；對一些拐彎抹角、用盡心機算計的，就會比較不能接受。

邂逅文壇與教育議題的啟發

1978年的8月多放榜，我考上了中興大學。其實是監所的朋友去查榜，他們又打來告訴我。原先他們以為我唸歷史系，放榜才知道我讀的是中文系。我回來七天就去考大學，理論上要向警察局報到。回來的時候，警察有來過家裡一兩趟，但我也沒去報到。放榜時報紙登很大，說我是監獄學校化成功的案例，當然是蔣經國的政績，就被大肆宣傳。父親做了一大堆剪報，《大華晚報》、《民族晚報》、《中央日報》都有，²¹還有電台的人來家裡採訪我，我同學來都很吃驚，「啊？這是你嗎？」我媽媽覺得這是很不好的事，不應該這麼張揚，我父親就把剪報都燒掉了。

十幾歲以來，我沒讀過什麼思想上的書，就是考試。我不是很習慣什麼大學生活，兄啊弟的經常沒事就跑去台中看我。我沒事也會回來埔心，這邊家裡人都還在，我也沒有多高人一等。在大學，我其實

20 王拓（本名王紘久）係於1999年2月至2008年1月間擔任第三至六屆基隆市選區立法委員；新竹監獄暴動則是發生於1996年11月19日，該案最初係因六工場受刑人挾持主管，提出減低工作量等訴求，最終於夜間造成全監受刑人的鼓譟和設備破壞。當日共有近五百名受刑人分別被移送往台中、彰化與嘉義監獄。見新竹監獄編纂（2013：32-33）。

21 見《中央日報》（1978年7月29日）。據該報導，范振國係於1978年6月24日獲得假釋。

過得蠻舒服的，因為中興大學學費不高，又很容易申請得到獎學金，我這些兄弟也會補貼我，我沒有打工過，錢也夠花了。爸媽都覺得我能考上大學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發現考上大學後我跟以前沒什麼改變，還是跟兄弟呼朋引伴的，他們的歡樂很短暫。但我還是有很明顯的改變，畢竟年紀也大了，不像小孩子了。

我東讀西讀，國中就讀過李敖《傳統下的獨白》，那時候書是越禁越想讀。我在學生隊的時候，日子一天一天地過，有一本書讓我思想上有很大的轉變，是唐文標的《天國不是我們的》。²²這本書是批張曉風《武陵人》的戲劇，因為天國不是我們的天國，天國要在地上建立，還有「怎麼樣在現實社會裡頭建立比較好的生活條件」，我第一次知道有這種想法。念了大學以後，讀了陳映真的東西，也比較會有這樣子的感受。

大學以後，我培養了閱讀的習慣。我那時候偏好閱讀文學類的書，那時的文壇就是痾弦、琦君、洛夫、余光中、楊牧、朱西甯、司馬中原佔據的。我什麼都讀，《書評書目》每一年的小說選，像季季、張系國、黃春明之類，²³沒什麼特別的品味。上大學之後，我父親跟姊夫常常去買黨外雜誌，不止是《美麗島》，康寧祥的《八十年代》都買，《台灣政論》也翻過。其實所有的雜誌我大概都摸過，但是沒有政治意識，也沒有辦法判斷優劣，只要反國民黨就很爽，根本不知道什麼情況。

一直到大學四年級，我才知道《夏潮》雜誌，是我思想史的老師王淮說，這個雜誌比較不一樣，他有一個同學在那邊寫文章。²⁴這個刊物

22 〈天國不是我們的〉一文原載於1973年1月出刊的《中外文學》第1卷第8期，批評對象為1972年11月至12月間連載於同刊的張曉風〈武陵人〉劇本，本文稍後與作者的其他文論一同集結成冊。見唐文標（1976）。

23 這三位作家獲書評書目出版之短篇小說選（1972至1979年間）選入的年度分別為，季季：63年（1974）；張系國：62、63（1973、1974）；黃春明：62年（1973）。

24 王淮（1934-2009），字百谷，安徽合肥人。於台師大國文系就讀期間，從學於新儒學大儒牟宗三，後先於高中任教，再應聘至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論、孟、老、莊與中國思想史。有《老子探義》行世，作品由門生唐亦男輯為《王淮作品集》（凡四冊）。

是甚麼思想系統，我也不知道，那時除非真的是有很敏銳的傾向性，讀《夏潮》才会有感受、才會走上這條路。黨外雜誌都是情緒宣洩、在罵國民黨，那才是最熱門的，《夏潮》上的題目根本就沒什麼市場，相對於那些雜誌而言銷路並不是很好，而且很不主流。

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我自然比較傾向鄉土文學一方，就會覺得像余光中他們站在權力那一方。那時反國民黨其實是很直覺的，我不知道鄉土文學真正的意識跟內容，就覺得余光中好像是捍衛黨國的。那個時候台灣的整個氣氛，反國民黨的意識漸漸成為一個蠻主流的意思。像余光中講「狼來了」，²⁵你當然不會知道什麼叫工農兵、講這些人是共產黨，但你已經反國民黨了，也就不會管它什麼，不會有特別恐共的感覺。我甚至覺得，最好是共產黨來，把你們給……，那時候我有那種心理。

教我文藝寫作的老師是林雙不。他教書的本名叫黃燕德，本來的筆名叫碧竹。他成名得很早，教我們的課是新文藝寫作，也是因為聽了他的課，我才知道陳映真。我們每一個人在班上站起來自我介紹時，他問「你讀過什麼書呢？」全班頭頭是道。我沒讀過什麼書，只讀過武俠小說，那個時候武俠小說都是禁書，像柳殘陽什麼小小一本的，也是要排隊看的。林雙不問我，有沒有讀過金庸的《大漠英雄傳》？我說沒聽過，他說讀武俠小說也很好，就在黑板上寫兩個人的書要讀：金庸跟陳映真，他說「這都是禁書，你們有機會都要讀。」那時陳映真被查禁的就是《將軍族》。²⁶

見蔡仁厚(2009)。另據范綱增、范振國2020年8月26日來信：「思想史的老師王淮是牟宗三的大弟子。」訪談者據上述經歷推測，王淮所說在《夏潮》上寫稿的同學應係指齊益壽。見齊益壽(1977)。

25 該文係於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發表，開篇即將台灣的鄉土文學指為與大陸中共政權相唱和的「工農兵文藝」。見余光中(1977年8月20日)。

26 《將軍族》一書係於1975年10月出版，1976年1月遭查禁。

林雙不還跟我們介紹了宋澤萊。宋澤萊找我們出去聊天，帶我們去彰化鹿港附近。那時〈打牛湳村〉系列已經寫完了，正在寫《蓬萊誌異》，我看過他幾篇很現代主義的作品，什麼《黃巢殺人八百萬》、《紅樓舊事》，²⁷我印象最深就是他寫了一篇講鹿港辜家的小說。宋澤萊後來也是蠻玄學的，我年輕唸書時，就很清楚地知道他的文學在為某一種政治上的東西服務。

教書是很重要的，好的老師引導了我們，讓你能夠知道原來有人寫這一些題目，跟其他的選材、主題完全不同。也因為林雙不，我看了楊青矗的《工廠人》、李喬的《藍彩霞的春天》。²⁸我們自己的寫作，因為這些關注底層的作品而走上這條路。你的寫作老師是這樣的，你會覺得這些作品跟風格好像是老師特別推崇的，當然會想要符合老師的期待，自己的寫作也會如此。我寫的東西，主要是關於自己的生活經驗。那時候寫得很晦澀，也不太會操作，就是受到「美文」的影響。林雙不看得出來我對一些受欺負的人的同情和不平，他希望幫我拿出去發表，我就說我沒寫完。我寫了小時候的生活、認得的酒家女的生活，或是在校園裡面看到工人在鷹架上摔死。那時沒有什麼階級意識，一個工人就這樣死了，你想表達對他們的關心，但是你會寫得好像跟死亡沒關係。

最開始寫作時，我很難避免受到楊牧、洛夫這類的影響。我後來看胡蘭成的東西，覺得很噁心，以前覺得他的文字真得很迷人，又有中國文化的情懷。那個時候已經出現反西化的新儒學，講中國文化的特殊性跟優點，但還不知道他在政治上的那些主張。知道後再閱讀他的文字，就會覺得為什麼歷史到了那個階段，他還在寫這些根本沒有思想內容的造句。

27 打牛湳村系列最早集結成冊發表於1978年9月；《黃巢殺人八百萬》發表於1976年，後於1980年4月集結成冊；《紅樓舊事》發表於1979年；《蓬萊誌異》則集結發表於1980年6月。見陳建忠(2007)。

28 《工廠人》出版於1975年，《藍彩霞的春天》則出版於1986年。

大學我參加了書法社，不過是一堆人寫毛筆，沒什麼特別。社團裡可以碰到各個不一樣科系的學生，不只談中文系的學問。我們書法社的社長叫安蘭莊，²⁹那時校長是羅雲平，³⁰因為校園地下道的施工偷工減料，出了工程的弊端，被媒體揭露，她就在朝會上舉手質問校長怎麼回事。這位外文系的學姊很優秀，本來可以申請出國，但因此受到了限制。這件事對我衝擊很大，等於是某種「政治教育」，我覺得怎麼會這樣。她寫的字也很漂亮，不會輸給董陽孜，長得人高馬大，鋼琴也彈得好，是一位非常有俠氣的人，她的發言讓我們都很震驚、覺得很有勇氣，但後來也受到很多的迫害。林雙不後來就寫了一本書叫《大學女生莊南安》，³¹官鴻志也做了安蘭莊事件的訪問，³²表示他們已經接觸到社會上這些事情。

作育英才

我大學的時候認識了鍾喬，他比我大兩屆，是念外文系的，我們共同的老師是施肇錫，³³我們這種不規矩的學生就跟他們這些愛喝酒的混在一起。他帶我去施老師家東聊西聊，大家夏天穿一條內褲、披個毛巾，一直喝著啤酒。冰箱都是啤酒，但我們喝得很慢，就在那邊瞎扯。施老師無聊寂寞、欲言又止，我們就喝啤酒，那個浪漫的氛圍就像沙龍那樣，怪裡怪氣、標新立異，沒事講兩句很驚世駭俗的話。

29 安蘭莊(1959-2020)，台灣台北市人，書法上師承王北岳、後隨吳平，2020年6月因癌症病逝。見安蘭莊書法紀念展(2022)。

30 羅雲平(1913-1984)係於1972年8月至1981年8月間擔任中興大學校長。請參考興湖記事(無日期)。

31 同名短篇小說〈大學女生莊南安〉發表於1985年，並獲得當年度吳濁流文學獎小說類佳作。見林雙不(1985)。

32 見史耘(1979)。

33 根據鍾喬的回憶，施肇錫在外語系教授的科目為莎士比亞，課餘則會與學生談論舊俄文學及三〇年代中國現代文學。見鍾喬(2012)。另據范綱堦、范振國2020年8月26日來信：「大學老師叫施肇錫，典故來自楚辭『肇錫余以佳名』。」

我在那裡還碰過林安梧、官鴻志、黃崇憲。我是他們的學弟，喜歡跟他們瞎混喝酒，那時候聊天的主題很文青，我在那邊知道三零年代的茅盾、沈從文，也跟他們一天到晚罵國民黨。鍾喬他們已經離開中興大學，到台北唸研究所，他們就把台北的那些時事帶來，說中興大學太封閉，人家已經翻天覆地。那時黨外雜誌的圈子已經有很多學生介入，特別是研究生去那邊寫東西、做傳遞員，帶回來給老師。其實那時黨外雜誌還是罵國民黨，認為萬惡都是國民黨，認識都很淺。後來鍾喬畢業了，在台北認識陳映真，帶著這些訊息回來，他接觸到《夏潮》並拿給我時，應該是我大四的時候。

按照當時的兵役法令，我這種判刑七年以上的，都禁止服兵役。不過這種法令它可以隨便改，可以說哪幾天不算，好像是通融，讓我浪費兩年當兵的時間。我後來為什麼可以去服兵役，也是因為他們說我提前一個禮拜假釋，所以允許當兵。大學的總教官找我去，問我為什麼不去成功嶺？原本念大學的男孩子大一上下學期的要去，但我不讓上的。他們後來又生了一套理由解釋：你符合資格，沒有被禁止服兵役。

我是大二的時候才上去成功嶺的，人家都是大一就去，總教官後來想個辦法叫我去的。上了成功嶺就可以去服兵役，我抽到空軍，要去雲林虎尾跟屏東東港受訓，分發分到台北松山附近，基地在現在的環亞百貨對面。³⁴我在空軍是警衛旅，根本就是站衛兵，什麼也沒事，所以我當兵是非常輕鬆的。而且我是國立大學的，他們對我很好，甚至說我只要入黨就可以坐辦公室，但我寧願站衛兵也不入黨。從小的教育，讓我對國民黨就有很多的不滿，入黨是一件很恥辱的事情。

我應該是在1985年退伍，退伍回來後就在明道中學教了一年多的國文。教書時盧思岳就坐在我旁邊，他比我小一、兩歲，應該是48年

34 環亞百貨為1983年落成、開幕，後因其母公司亞洲世界集團面臨財務危機，幾經轉手後，現址為微風南京，見自由時報(2015年7月21日)。

次(1959年)，原先在輔仁大學念經濟系，又降轉跑去跑去東吳大學念中文系。思岳也教中文，他蠻敢衝的，還很有文采，課餘時他會編詩集，像是收錄艾青的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我讀了就說：「你咧創這喔，我有一個朋友嘛寫詩的喔。」我指的是鍾喬，原來他們在台北的詩社小圈子裡都小有文名，都已經彼此認得了。

我跟盧思岳教的都是夜間部補校的學生，新進老師通常都會先在補校觀察。日間部教升學班的老師，在學校地位好像都比較高一點。明道有個陋規，每位畢業生都要樂捐五百塊給學校，叫做「畢業捐」。有些學生跟我們反映，說他們沒有這筆錢，很多老師都是自己把錢湊齊，交給總務處。我們不幹這個事，甚至反對，因此跟學校起了衝突，甚至寫了文章，登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³⁵還去跟金恆煒見過面。學校就開始追查，看怎麼會有這種壞份子，後來我們就離職了。

離職之後，我去了新民商工，盧思岳跑去精誠中學。新民是職業學校，我教的是日間部會計科的國文，大概又教了一年半，這時才發生了反杜邦運動。那時我們常常去台中鍾喬家裡的閣樓，因為鍾喬當兵，他放假就會約我們來喝酒東聊西聊，主要是盧思岳從彰化來台中比較多，反杜邦時我們就一起跑去了鹿港。

走進鹿港反杜邦³⁶

在鍾喬家的閣樓，我們幾乎無所不談。因為鍾喬比較早接觸外頭政治上的事情，會跟我們講一些政治方面的事，但大概比較多還是談一些比較浮泛的文學上的感受。談談文學、聊聊電影，一點政治上的不滿的批評，沒有很集中的話題，也沒有特別具體或深入的社會事

35 見中國時報(1985年5月29日)。

36 本段內容亦可參考范振國(2016)。

件。我們在教書，鍾喬在當兵，當然也有些生活上的閒談，比如我們覺得學校很難接受的一些事情，或是鍾喬在軍中的一些事情，這不是有很重大的議題的那種談話，就是很浮泛的瞎聊。那是陳映真的《人間》雜誌創刊不久，³⁷比較集中的話題大概是聊《人間》，也因為鍾喬他跟夏潮系比較接近，所以也會談一點《夏潮》的社會關懷。

《人間》雜誌創刊的時候，陳映真曾經下來台中，由鍾喬組織，找來一些中興大學的同學，有外文系的教授跟學長，還有幾個在教書的我的大學同學。陳映真是很有心的人，他當時希望鍾喬組織中部的教育工作者，主要有兩個任務：一個就是擔任《人間》的地方通訊員，如果有什麼地方上的事務，比較重要或值得報導的，請我們當作他的通訊員、寫手或地方記者。另一個當然就是幫忙宣傳、推銷。可是那天陳映真很少講這個事情，他就講他對台灣教育政策的批判，講自己以前教書的經驗。

我以前讀了陳映真很多東西，他在我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在冰果室他講了《人間》的想法，希望我們能夠幫《人間》一點忙。大部分時間他在講教育，再接著講《人間》、講知識份子。他還講到范澤開，是個跟山地的小女孩結婚的老兵，那個小女孩沒事就跑回去，一回家就大肚子、生個小孩，又跑出去，再回來生個小孩。這個范澤開一直把這些小孩養得好好的，讓他們讀書，小孩子從來沒有怪罪他。³⁸陳映真認為像這樣生命的光輝，讓人很感動。反觀一些讀了書的知識人，頭上不知道已經累積了多少自己的光環了。

陳映真很會講話，可能因為我們這些教育當局、校園裡頭的人是最保守的，他不願意直接驚動這一些人，講的很多都是「人間燈火」、³⁹比較溫暖的事情，希望我們關注地方的事務。他也批判了媒體

37 《人間》雜誌係於1985年11月創刊。

38 見李文吉(1985)攝影撰文。

39 人間燈火是《人間》雜誌的常設專欄之一，主要收錄「表現具有強韌的生命力、卓著

的速食：「什麼天大的事情，登個一兩天就沒有了。」他希望我們能夠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像是地方上一些大家不注意的事情、忽略的事情，深入地去追索。跟大陳（按：指陳映真）開完會後，我自己去訂閱了《人間》。我是長期的訂戶，用實際的行動支持。

過沒多久，我就有了反杜邦這個學習的機會。最開始是鍾喬剪報給我們兩個看，招我們去他家閣樓，說有這種事情，也許我們有興趣了解一下、關心一下，可以給《人間》雜誌做個通訊，請他們派記者下來。鍾喬大概去跟大陳做了這個回報後，就來找我跟盧思岳，他也知道我們本來就對政府、對學校不滿，反正就瞎批評。要下去鹿港之前，陳映真請鍾喬找我們兩個老師去印一下名片，就用了《人間》通訊記者的頭銜。

我們首先去員林找了林雙不。林雙不在大學時期就蠻疼我的，盧思岳是寫作的人，他也知道林雙不，我們跟他講我們是《人間》雜誌的通訊記者。林雙不很關心地方事，他跟我們介紹東海有個叫施威全的鹿港學生，在這事情剛發生不久時，他就自己跑去鹿港做了問卷調查，我們就去找他。⁴⁰林雙不想說，我們怎麼會跟陳映真一起混，他覺得很可惜。他說，「很可惜陳映真是一個統派」，我們那時候也不大懂。威全他們家是仕紳家庭，他帶我們去了反杜邦運動者李棟樑家開的金香舖，但是第一次去，家裡空空的；第二次去才真的見到人。

施威全的問卷其實很粗糙，不像台大吳介民他們的比較有設計，⁴¹可是施威全是最有行動力的。施威全後來常說，他認為反杜邦起

的貢獻、感人的奉獻和愛心的個人的故事」，如第一期李文吉的〈李天和葉美惠：一個愛情故事〉、第二期李文吉的〈我的朋友范澤開〉、第四期王思茗的〈阿德，加油啊！〉、第五期王墨林、蔡明德的〈斷臂中昇起的聖歌〉等皆是。見人間雜誌編輯部（1985）。

40 施威全受訪時指出，該項問卷是於1985年秋天向鹿港當地民眾發放。見聯合報（2016年12月5日）。

41 見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1986）。

義的第一槍要把功勞算在他身上，我覺得當然不是他，其實是地方的人本來就在做連署簽名，王福入先，李棟樑才跟上。⁴² 那時候也沒什麼反對或不反對，全部都是政治操作的想法。吳介民他們的參與比較有指導性，真的是有點外來者，甚至有點菁英。當然他們下來做這個是很有想法，我們也有我們的想法，但真是不一樣的想法。現在的路就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們這一批人在台灣社會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反杜邦運動剛開始很靜態，我們做了巡迴演講、slide show(幻燈片放映)或座談之類的。後來準備上街，比較大的衝突跟媒體的傳播有關，以前台灣的媒體都很local(地方導向)，地方事務上全國版是很少見的，何況是環境議題、還跟外國公司有關，那根本不可能嘛，一定被壓制。但是反杜邦運動突破了，讓全台灣都知道鹿港這個小地方有這種事情，而且有一點規模。各路人馬都來了，也給地方很大的鼓勵。

我那時候的閩南語沒辦法很順暢地表達，個性上也比較害羞膽怯，沒有像盧思岳他們這樣，可以面對群眾侃侃而談。我沒有在巡迴演講時上台演講，大概就是上去幫忙拉布條。私下的座談可以，但上台就不大一樣。主要就是幫忙寫文宣、寫稿，還有膽寫大字報，掛標語、跟著跑、準備資料開會。中文系的訓練對我當然有幫助，寫文宣的時候你也不能夠硬梆梆的，就要寫一兩句五言絕句當演講的開場詩。我還幫忙編了《鄉情》月刊，⁴³ 原先的《鄉情》是李棟樑為了選舉辦的地方文宣廣告，沒什麼內容，我們把它接了下來。我們是在林華洲的夏潮論壇社編的，他一個人在臥龍街，很多文化社的學運份子也常去他那邊。這又是我跟大陳這些夏潮脈絡有的另一些關聯。我最早寫

42 根據陳秀賢整理之反杜邦公害日誌、粘錫麟整理之鹿港反杜邦運動大事紀，王福入係於1986年1月20日發起連署，李棟樑則於同年2月27日發起連署(粘錫麟則認為係2月1日)。見陳秀賢等(1986)、賴佩茹編著(2008: 87-88)。

43 據《鄉情》雜誌各期版權頁，1986年8月號起之編輯委員為許慶修、粘錫麟(1986年8月至9月號、1987年5月號)、葉權煌(1986年10月至1987年5月號)、丁國富、王康壽、陳秀賢、盧思岳、范振國、陳鴻儒、蔡明德。

反杜邦，是在王津平的《遠望》創刊號。⁴⁴ 當時還有楊渡邀我在《新環境》上寫反杜邦的歷史脈絡，⁴⁵《夏潮論壇》就沒有寫了。

我跟粘錫麟非常要好，⁴⁶我在反杜邦裡頭交往最深的就是他，他蠻喜歡古典文學的。鹿港文風鼎盛，他們都是寫傳統漢詩的，我們打勝仗的時候，他給每一個人送扇子，上面有他自己寫的詩、毛筆字。很可惜的是，我的這把扇子因為我家裡遭小偷被偷走了。他也喜歡喝酒，比較浪漫。粘老師過世很久了，他走的時候我都沒有勇氣去看他。

反杜邦的學習：語言、知識與政治

我永遠記得那些鄉親說，「你們這些讀書人拿筆的，比較會說會寫，要幫我們。」你才知道你原來是有被託付的。以前讀書，你會背誦什麼「以天下為己任」這一些耳熟能詳的詞句，但你從來不會知道，那跟你生命根本沒有關係。去鹿港時我們年輕氣盛，本來也就是這種個性，沒想到竟然有人這樣子託付你，對我來講是很大的一個教育。你會覺得為什麼說你會走上這條路，對很多價值觀帶著一點底氣的鄙視，就所謂的「知識人」你會有另外的評判，這都是你自己生命裡頭長出來的。

44 見范晨河(1987)。

45 據該文所說，鍾喬曾於1986年3月中旬受《人間》之託，前往鹿港進行調查，范振國和盧思岳協助他進行資料的收集；1986年4月5日，范、盧兩人利用學校春假，「以僅得自於幾張剪報的有限資訊，騎著老舊的摩托車，頂著鑽骨的冷風，前往鹿港。」見范鎮國(1987)。

46 粘錫麟(1939-2013)，彰化鹿港人，曾為彰化王功國小、高雄大社國小、福興日新國小與新寶國小之數學教員，後為鹿港反杜邦運動之關鍵人物，並在反杜邦後全職投入後勁反五輕等環保運動，自號「環保弘法師」。粘錫麟對范振國的回憶是，他「當時是台中市新民中學的老師，也在運動結束後離開教育界。他為了運動，連妻子早產剖腹時也不在身邊；後來成立一個專門協助中輟生的組織。」見賴佩茹編著(2008：85)。

反杜邦運動很豐富，讓我們的人生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個人從那裡頭真正看到所謂的人民、生活、土地發生的事情，碰到類似這樣的不公，你會比較認真地看待，也會有行動介入的動力，不像以前只是觀察批評，或是口說不練、空口白話，我也因此覺得反抗的勇氣真的是需要不斷地鍛鍊。你的寫作思考也開始有所改變，會認為寫作主要是為他們傳遞訊息、讓他們理解，我們常常講「我們的作品就是傳單」，後來我大概就很少寫作。

我跟盧思岳一般很少跟所謂地方的人、所謂的鄉親百姓一起生活，我們沒有近距離接觸，不大知道他們的想法。去的時候發現，我們可能連怎麼跟他們溝通的語言都要重新學習，我們講的話跟他們講的話是有一點距離的。閩南語是另外一回事，你說的就不會是很庶民的語言。你可能在家裡跟家人閒話家常的時候可以很自然，可是一跟沒有血緣或關聯的陌生人講一點正事的時候，你發現你不知道怎麼表達，就是聽他們講他們生活上的、對政府種種的不滿，聽他們講為什麼他們要反對。

原來我們跟所謂的土地、人民，根本就不搭嘎的。光是讀那些書，我們好像滿懷理想、正義、人道，其實都很掛空。去的時候因為你要理解這些事情、要東問西問，人家也會問「你來幹嘛」，你要去跟他解釋，就要講「我們是《人間》雜誌的特派員」。要怎麼用他們比較聽得懂的語言說，對我個人來說是很大的學習跟教育，才知道原來生活上有那麼多話題。去鹿港的時候就不只是反杜邦，你就進入社區的生活，各種各樣的話題就來了。比方像木工工會郭繁男的小孩不唸書，常跟我們一起搞東搞西，盧思岳要是文宣寫完了，還會幫他兒子義務當家教。你跟這些人有那樣生活上的交流，這個是很不一樣的學習。

下去鹿港的時候，我們要讀物理、化學，還要讀政治經濟學。你不是為了學問的追求，你就是要運用，要跟百姓說什麼是二氧化鈦，它的污染跟科學標準。碰到環境鬥爭一定都是這樣，官方講它的污染

值很低，我們就要跟老百姓講，你這個零點一、那個零點一，你生活的全部都是污染，加起來就不只是零點幾，「彼是幾百！」你要用這種話，大家才聽得懂。

我以前不知道原來知識的範圍那麼廣。你唸文學、有文字訓練，可以在現場比較通順地表達，知識整個就開了。你才知道原來知識學習應該有這麼寬的視角，真的要為人所用。我以前甚至買了一大堆毒物學辭典，試著去瞭解二氧化鈦的製造過程是什麼？還要想該怎麼講？你要用百姓聽得懂的話，說他們用什麼容器裝，萬一漏氣怎麼辦？大型的演講都是鼓動，小型的座談就要講這一些。鄉親講說「你們真的是有點唸書」，老人家就像疼子弟一樣，覺得有外地來的學生關心。我也因此反省，大學分成什麼系、什麼系，怎麼會一個學問變成什麼系，就一輩子地讀？

對抗的時候也會鍛鍊出你的勇氣。文學、歷史記載說有人朗然赴死，這絕對不是騙人的。有了信念之後，人會覺得生命是真的可以超越。我們不到這個程度，但也從一個讀死書的人，跟著他們一直鍛鍊，除了對所謂的壓迫不可忍受，會有比較強的義憤之外，也會產生一種以行動介入的動力。所以文字是要鋪陳一個世界的，我當然傾向所謂的「現實主義」，希望能夠寫出真的有一點點人的生活跟生命的東西。也就會覺得，我們才不要寫胡蘭成的那種玩意兒。

後來的很多運動，基本上受利益的分化，力道很弱，很少看到真的不為利所動的人，但是一定有一小部分，多半就變成了非常地邊緣，甚至根本就不為社區所用；要不然至少會有一個干擾破壞的力量。所以反杜邦是很難得的。反杜邦也無所謂「外力」，我們以前講都是「外力介入」，反杜邦反而是各路人馬都來，他們真的是很包容，完全不會去提防你。後來新潮流系的人開始介入反杜邦，我們當時已經把整個運動的規模跟基礎定了調，成了氣候。當時我個人沒什麼政治敏感，但他們很敢，新潮流系有一些幹部已經是公職，因為編聯會張

富忠的支持，吳介民他們才會下去鹿港，去那邊辦說明會。⁴⁷這真的是所謂「收割政治資源」，我覺得很不堪。

還有一件事情在那時跟著發生，是林正杰的街頭狂飆，⁴⁸這些民進黨沒有一個人敢上街，全部都尿褲子。那是在反公害之旅出發之前，我應該已經認得林正杰跟楊祖珺了。說幸運也好、不幸也好，我在反杜邦的街頭被鍛鍊過、見過陣仗，膽識比他們大。第一次上街看到警察過來，真是會軟腳。我們在鹿港，林正杰到台中來，因為沒有辦法號召遊行示威，他要辦告別演說，就到每一個公園去。演講的時候，鎮暴警察把所有民眾團團圍住，消防車上的大喇叭擴音放「梅花梅花滿天下」之類的軍歌，直接鎮壓你的聲音。每一個人都期待民意代表來，好像他們是無敵鐵金剛一樣，但他們全部都不敢。只有陳素香跟林正杰的妹妹拉著布條，一直跟鎮暴警察對峙，她們真是女中豪傑。我們剛開始真的是不敢，後來覺得應該站在一起，雖然有點膽怯，還是跑上去跟她們一起拉布條。

廖莫白是我們在反三晃的時候結識的，我第一次拿到有作者簽名的詩集的就是他，才知道原來他們是春風詩社這一些比較進步的詩

47 根據張富忠的回憶，他是因為參與編聯會的工作(時任會長)才知道了反杜邦運動，「那時吳介民他們這些學生也來找我談過話，討論這個議題，我在當初是很鼓勵這些學生去參加這個活動」，他也特別讚賞台大杜邦事件調查團以「軟性的去調查」的策略參與運動。吳介民則回憶道，「1986年三月遇到富忠，他說：美國杜邦公司預計在彰濱工業區設立二氧化鈦廠，鄰近的鹿港正在進行『反杜邦運動』，問我們有沒有興趣投入？沒多久，我就和兩、三個社團朋友，到鹿港去了解初步狀況，記得是跟菲林、富忠等人一起去的，感受到當地社區動員的熱絡。」此外，粘錫麟則與范振國有類似的觀察，他比較台大學生在鹿港反杜邦的調查與成大、輔大學生在後勁反五輕的參與，認為「台大的學生真的比較有優越感，他們到鹿港來，只是一個客人，像觀察團之類的在旁邊看，並沒有實際融入運動或社區裡面，也鮮少跟其他團體來往，待幾天就回去了……」。見張富忠(2016)、吳介民(2016)、賴佩茹編著(2008：78)。

48 1986年，黨外人士林正杰於擔任第五屆台北市議員任內，因質詢國民黨籍市議員胡益壽違法超貸一億元一案，遭後者控訴涉嫌誹謗、違反選罷法規定。台北地方法院於同年9月宣判應服刑一年六個月後，林正杰即在入監服刑前，於台灣各地發起數十場抗議活動，是所謂「街頭狂飆」。

人。以前我們看詩都要費很大的腦筋，我還要自以為能夠解釋詩，但《春風》的那些詩就很現實了，不是像余光中寫那些我們看不懂的。廖莫白是新潮流培養出來的，後來當了台中縣縣長。⁴⁹林正杰演講時，不能老是讓正杰講話，麥克風就交給了廖莫白，他拿麥克風抖得跟地震一樣，這是有多勇敢？後來大家說，等一下九點多正杰他們要去哪個冰果店，這麼熱，邀大家一起去吃冰。連這種場面，民進黨也沒有一個敢來。

加入《人間》雜誌

除了去總統府是運動抗議外，杜邦結束前，我就跟陳映真這個知識脈絡的人見過兩次了。其中一次是陳秀賢帶我們去的，秀賢跟夏潮的關係很深，但他是夏潮的「異端」，一個非常爭議性的人物。陳秀賢是去跟夏潮的老同學邀功的，他們原本想說永遠只有陳秀賢這種土流氓，怎麼會有兩個高中老師，對我們非常疼愛。陳秀賢把我們帶到夏潮去，夏潮正在開會，應該是開分裂的會，像南方朔、大陳他們都在，但是我們跟他們不熟，陳秀賢就帶著我們去介紹，「這兩個是參加反杜邦運動的。」過沒多久，原先的《夏潮論壇》雜誌就沒有了，改成《前方》，變成林華洲在編。⁵⁰

另一次是我去《人間》的辦公室。那時我在《鄉情》寫文章，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那篇，是在辦反公害之旅的時候，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太地方意識地說「不要在我家後院」就好了，應該是不讓杜邦在台灣任何角

49 廖莫白，本名為廖永來，係於1997年12月至2001年12月間擔任台中縣長。

50 《夏潮》雜誌於1979年2月遭禁，1983年改以《夏潮論壇》繼續發行，初由蘇慶黎擔任總編輯。1984年時由陳映真進行革新改組，由官鴻志接任主編，同年11月該刊因評論江南案而二度遭禁。1986年2月，《夏潮論壇》再度復刊，並由林華洲主編。該刊於1986年後再度停刊，林華洲於1987年2月於《前方》雜誌繼續主編。見茅漢（1999）。

落設廠，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從「我愛鹿港」到「我愛台灣」〉。⁵¹我去《人間》雜誌的時候是高信疆編，他看了我寫的東西，說我蠻有文化的。

反杜邦時，鍾喬跟官鴻志已經在《人間》雜誌工作了。我要去《人間》雜誌之前，官鴻志做了整個濁水溪流域的調查報告，⁵²期間他常來台中，那時我還在新民教書，他就會到我住的地方跟我聊天。他很早就跟陳映真有聯繫，大概是因為黃崇憲的關係，崇憲他很有交往的能力。後來應該是1986年的年底，上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阿官（按：官鴻志）找我說「《人間》缺一個編輯」。我們很多的朋友把《人間》就當成經典，怎麼可能有這個能力去那邊工作？那是我想都沒想過的事情。

教書的待遇不錯，我心想，「我教書一個學期都還沒結束，怎麼就急著要人？」我得去想辦法。其中一個在醫院工作的學長，是在書畫社還什麼地方喝酒認得的，他叫我去他的醫院掛號，進到他的診間躺下去就開始聊天。我說：「陳映真的《人間》雜誌需要一個編輯，找我去，我現在在教書，不知道找什麼理由辭職。」他說：「我給你開一個罕見疾病的證明，你如果不趕快辭職，將來因為你的聲帶會一直長出

51 該文認為，雖然公害污染在當年的台灣不斷發生，反公害團體的組成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功能，但是這些反公害團體往往有「嚴重的地域侷限性；也是就說一旦他們所抗爭，清算的污染源，被迫停擺，或遷移他處。這些團體便立即像一只洩了氣的皮球，再也無法運轉（訪談者按：應為「運轉」或「應戰」的手民之誤）。臨時組合而成的便自然崩潰瓦解。有永久性組織章程的也徒剩一具空殼。」因此，反公害之旅的意義便在於「打破『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保守觀念。到任何有污染的角落、鼓舞出一個反公害團體的誕生。然後彼此聯結，互相聲援。唯有如此手牽心連，連成一道綠色的長城，才能抵禦一切污染的惡浪，也唯有所有反公害團體的互扶互成，才能匯為一股威猛的環保巨濤，沖刷一切的不義、污穢。」見范振國（1986）。

52 該調查成果以「一條河流的生命史 第二部：濁水溪」為專題主題，發表於1986年11月出刊的《人間》雜誌第十三期，由黃瑞、陳秋松的〈序章／古老的農業動脈 苦惱的河流・土地・農民・農業〉；官鴻志、廖嘉展、朱心嚴的〈第一章／上游篇 2,000公噸腐敗中的玉米〉；李疾、李文吉的〈第二章／中游篇 美麗的稻穗，不美麗的價格〉；李疾、林柏樑的〈第三章／下游北岸篇 吾鄉印象〉；王墨林、廖嘉展的〈第四章／下游南岸篇 流過多少五穀豐登・農村凋敝的故事…〉；編輯部的〈終章／地理篇 濁水溪的體檢報告〉等六篇文章組成。

某一種東西，你會變成啞巴。」這個病有醫學專門的名詞，沒有人查得出來。學期都還沒結束，你硬要辭職，就要想一個根本不能教書的病，讓你不能在課堂上講話。

其實新民的學生跟校長都很喜歡我，但去《人間》是多麼千載難逢的機會。拿了那份證明，我對學校假裝說，「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學校，但是我真的如果不離職，我怕我真的沒辦法。」當然就准了。我的離職書還拿給官鴻志看過，他就說，「這是高中生寫作文，四平八穩。」給我開開玩笑，然後就搞定了。

准了之後，我就連夜就到瑞安街的《人間》辦公室，那時候曾淑美跟阿官都在，阿官來辦公室就是為了接我，第二天我才見到陳映真。陳映真也沒說什麼，就說「編輯工作很辛苦」，我跟他講說：「我沒幹過這檔子事，我不會編輯。」我當時就只有在中文系編過系刊的經驗，⁵³林華洲也有幫我們編《鄉情》，我們就只是寫稿、供稿。大陳說：「沒關係，你學嘛，你有一點文化，沒問題的。」陳映真的小說〈雲〉裡的主角張維傑請了個秘書，她去跟張維傑應徵的時候，張維傑講的那一番話，就像是陳映真跟我講的話。⁵⁴

我去的第二天什麼也不懂，怎麼編雜誌、怎麼組合，這都很陌生。大陳要我先看圖片，我的第一個文字工作，就是看林柏樑拍的器物還是磚牆的彩色圖片，幫他寫圖說。林柏樑他們是大師嘛，從來就不寫圖說，照片丟給你就是自己想辦法寫。大陳根本連看都不看，然後他就是跟你講說，「照片的故事有很簡單的，也有內容很深的。」

我在《人間》的工作其實就是做執行編輯，我接替的是高信疆的工作。我應該是從第14期開始編，但其實第13期我就開始在《人間》工

53 刊名為《中興文苑》。

54 在〈雲〉中，秘書朱麗娟和貿易公司老闆、男主角張維傑初次見面的對話場景如下：「〔…〕原來只想請個能照稿打字的小姐，卻不料來了英文名字叫Lily的朱麗娟，講的、寫得一口、一手的好英文，進出口業務比他這才出道的人還熟練。

『你一進這辦公室，就該知道，我請不起你。』見陳映真（2001：2）。

作了，第15期的〈親愛村報告〉我則完全介入參與。⁵⁵第14期講圓山貝塚的配圖是陳映真描的，⁵⁶我才知道他繪畫的功底，那時候我們工作到很晚，他叫我描，我說「我不會，我畫都很笨」，他就把圖按上描圖紙，一筆一筆描出來。陳映真跟台獨派論戰台灣史的時候，你會發現他的歷史感很強，他對台灣史的掌握非常深。《人間》其實有很多計畫都沒有辦法實現，像是在圓山貝塚以後，本來要做接著做卑南遺址，後來報告下去卻無疾而終。

跟陳映真的接近，聽他跟記者談、他開編輯會議，會很開闊你的眼界。編輯會議是大陳把大家找來，坐著就開始講。會議是不定期的，《人間》哪有什麼固定的事，人也不固定。陳映真有想法的時候，當然就是大計畫、主要計畫，是要全社配合的他才會提出來，要不就編輯做。其實也沒什麼編輯不編輯，就是記者或這些一起工作的朋友，報告說想做什麼。比如大陳對青年的問題感興趣，所以我們做新青年、新種族，⁵⁷他覺得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要怎麼樣去掌握小孩子的世界，他就會有一套分析，再叫記者認領題目。大陳對一些事情的分析完了，其他人各自講想要做什麼題目，你要出去前他找你談一談，要不就是你回來以後告訴他現場，要不你文章交出來，他就叫你重寫，或是說叫你補採訪，是這樣的過程。

我因為是編輯，跟他一起工作，通常就是處理稿件的問題。像他一樣跟記者談「你出去愛注意啥」，大概就是幫他分擔一點點這一方面。因為《人間》是文字跟圖片的搭配，像李文吉、關曉榮，可以拍好照片又可以寫好文章的人很少，通常都要能拍照的。就像大陳講的，「照片拍回來了你要寫報導」，有些人頭都抓破了都沒辦法。

55 見官鴻志等(1986)。

56 見張光直等(1986)。

57 見李文吉等(1987)。

懷想大陳與《人間》同仁

我有整整一年都待在《人間》雜誌，最好玩就是我跟蔡明德的互動，一起喝了很多酒，是非常好的經驗。陳映真是來者不拒的人。像曾淑美是自動去應徵，⁵⁸當義工開始的，開始的學習就是先叫淑美校對、下小標題，一步一步地帶。他要你寫一個短的東西給他看，跟報導都沒關係，就先寫短的，大陳找時間會教你怎麼改。記者可以自己請纓出去，也不一定要待在辦公室，回來就寫給大陳。凌鈺是行政工作的人，大概是業務部門的，他老婆李翠瑩也是大陳一路帶上來的，她跟淑美一樣最開始都是做資料整理，一步一步爬，後來再到助理編輯。所以我算是很特殊。我後來想，大陳其實在反杜邦運動的時候，透過鍾喬、官鴻志，對我有一定的觀察，如果我能夠很稱職地當一個編輯人員，符合理想是最好，要不他可能會有另外的安排。

我在當編輯時，人間雜誌社還在瑞安街上的巷子裡邊，一樓是大陳的總編室，還有會計跟業務部門。樓梯下來的地下室，第一間是桌球桌，可以是編輯檯、割字或開會用的；再進去一間是大陳的辦公室，放的就是一般的辦公桌；再旁邊是比較空曠的空間，擺了幾張桌子，也沒有什麼家具。那裏沒有床或沙發，如果喝醉酒就用紙板墊在那邊睡覺。有兩間洗手間，樓上的洗手間是當作暗房來用，廚房還可以用來燒水。大陳不住在那邊，他都是早上八、九點，我們還在酣睡、爛醉的時候來的，他會故意咳嗽很大聲，我們不理他，他也拿我們沒辦法。

有一次我們在加班，在地下室用乒乓桌拼起的工作桌上，幾個工作人員像阿官、大陳、我，還有拍照的攝影師或採訪者，五、六個人在討論。接近凌晨的時候，阿官還跑去永和豆漿買點心，馬以工、柴

58 根據曾淑美的回憶，她是於1985年11月《人間》創刊不久，就主動跑到雜誌社拜訪陳映真，詢問能否擔任義工。見曾淑美（2009）。

松林還有《中國時報》的一些高階主管來看我們，其實是來辦公室找大陳，晚了就陪我們工作。大陳常常陪我們這樣子趕，真的是不簡單。他們來大陳就說，「我們雖然廟小地方小，但你可不要小看我們這些小朋友，出去都是總編輯的料。」他很自信地介紹著我們。像淑美(按：指曾淑美)去了意識形態廣告公司，她是行政總監；陳斐雯去到《中國時報》一定是某一個版面的主編，蔡桑(按：指蔡明德)當然就會是副總編以上了。

陳映真很早就想培養年輕人出頭。《新新聞》還沒有創刊之前，王菲林跟我負責整個編務，主要是我編，因為菲林事情多，他也在《聯合文學》兼職。⁵⁹有一次大陳叫我們兩個人選一個身份，他說，「你們兩個人，看誰一個人掛總編，一個人掛採訪主任，你們自己兩個人商量協調。」我們就問陳大哥說「要這個名號幹嘛」，他說「也許有一天用得上嘛」，可是他講完就算了，我們聽完就走了。後來一些朋友邀我去《新新聞》的創刊酒會，⁶⁰他要介紹你的時候，不會介紹你是《人間》的執行編輯，而是說「這是接高信疆的《人間》總編輯」。你那個年紀會覺得這些都是虛擬的，後來還是覺得是虛擬的，但也覺得大陳的用心很深。我因為跟大陳跟得比較緊，送客人要陪著他去，所以我才聽到了那麼一句話，是他對這些人的期許。我在《人間》雜誌的時候，自立的攝影刊物《台北人》要創刊，⁶¹人家打電話給我，說你過來這邊，月薪四倍。但我寧願留在《人間》，領那一萬塊錢，卻很有榮耀感。

編輯這個過程包含各種人的互動：你要調配文字跟攝影，大家會有衝突、誰不願意做什麼，要磨合協調。你知道，要在《人間》寫稿，

59 根據《一曲未完電影夢》所附之王介安(菲林)年表，王菲林係於1985年5月至1986年5月間在《聯合文學》任職。惟年表上稱1986年5月「辭《聯合文學》，同年進《人間》雜誌擔任編輯並策劃叢書出版」，有兩種可能：一、在任職《聯合文學》期間，王菲林已在《人間》從事兼職；二、在到《人間》服務後，王菲林仍在《聯合文學》兼職。

60 《新新聞》係於1987年3月12日創刊。

61 《台北人》係於1987年9月1日創刊。見自立晚報(1987年9月1日)。

壓力是很大的。總編輯是陳映真，過關的時候就好像登了龍門一樣；你不過關，那該多挫折啊！好像搞一輩子寫作，卻過不了他的關，所有人都很挫敗。在陳映真手下工作，哪這麼簡單，你可以登上刊物，那開什麼玩笑，當然會有很大的滿足感。當時有登上刊物的都不簡單。

說是這樣說，大陳對他自己訓練的這些人還是很寬厚。例如賴春標，他非常熱愛山林，因為目睹著山林被砍伐，他的取鏡就是要把那美的留下來。他的生活是非常樸素，我們都叫他「森林王子」。他是很簡單的一個人，沒什麼慾望，就是自己準備重裝的防護設備跟乾糧上山拍照，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主動拿來給大陳看。大陳看了就問，「為什麼來找我？」賴春標說，「我覺得你這個《人間》雜誌，跟《大自然》他們那邊不一樣，你不只要漂亮的、美的而已。」大陳覺得很好奇，就接著問他，「那你怎麼拍得這麼美？」他說，「我要告訴你山裡的森林怎麼被砍。」大陳說，「你把它拍出來了，也要把它寫出來啊。」可是賴春標真是不會文字寫作，要不寫得很短，就是講話都是娓娓道來，從盤古開天講起，講得非常瑣碎，大陳受不了他長篇大論，叫我去聽他講、幫他改。雜誌社其實有很多改寫的寫手，像大陳本人、季季，在不違背他的意思下，用你的文字把它表達出來。

說到業務部門，像曾伯堯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大陳很得力的助手，從《人間》離開後，他有一段時間跟著楊憲宏的刊物，李文吉後來也去了。伯堯很少有文字上的表現，大概都是行政上的協助，是協助陳映真很多的人，我記得他還跟王菲林一起做過傳播公司。⁶² 菲林是我到《人間》之後才認得的，他人高馬大，主要都是在做跟電影有關的事情，可是不止，他的文字產出都是寫電影比較多，然後他帶學生搞讀書會，活動非常精彩，非常有活力，精力旺盛。他有一本紀念文

62 根據《一曲未完電影夢》所附之王介安（菲林）年表，王菲林係於1988年9月集資創立新動力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業務在在1989年4月暫告結束。

集叫《一曲未完電影夢》，⁶³是簡嫻幫忙編的，他是非常熱情有行動力的人。

吳文娜是會計，她也很不容易，是我們的管家婆，除了管會計、管支出，領錢之外，她會給我們泡茶，還罵我們「喝酒亂喝，不洗澡、臭死了」。她貢獻很大，雖然《人間》給了她非常低廉的薪水，都不到一萬塊錢，她還要在假日的時候去做教會的志工，真是對我們非常好。陳映三是大陳的弟弟，我們都叫他三陳，大陳實際上是二陳，他有五個兄弟，我們叫陳映真大陳，還有中陳、三陳、五陳還是小陳，小陳好像是陳映真同案的，開印刷廠。

在寫〈趙南棟〉的時候，陳映真人還在台灣。為了不要被人家打攪，還留了一支電話給我，不知道是他的哪個親戚的家裡。我們還有約定暗號：要先響兩聲，然後掛掉，接著再打。不是因為戒嚴時期怕被監聽，是他不要讓人家、讓其他事情干擾。所以我們都不知道他怎麼寫的。當他寫完〈趙南棟〉之後，季季她們就自動請纓，看了初稿、開始校對。大陳本來是寫小說的人，所以有些時間、年紀會看得出來有些前後不一致的小毛病，季季跟他挑出蠻多描寫上有矛盾的地方。⁶⁴

編《人間》的時候，很多人都去志願當義工。因為陳映真在精神上還是大家的中心點。不是說他會去分派我們的工作，畢竟大陳這個人很不喜歡麻煩人。他如果要寫稿，就會跟我說。像在後來我去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時候，他為了寫篇大文章，躲到咖啡廳去。我也不

63 見簡嫻等主編(1993)。

64 根據季季的回憶，她是受高信疆的請託，到《人間》無償協助從事稿件整理、修飾、代筆或會議記錄的工作。1987年6月，季季協助閱讀〈趙南棟〉原稿，並以第二節「趙爾平」轉載至《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她同時發現，陳映真「可能因為應付《人間雜誌》的編務與業務太忙，寫完〈趙南棟〉沒空再仔細修飾，我發現其中有不少敘述邏輯錯誤：包括人名、年齡、情節前後不一的問題。」為了修改該文的問題，「當時他恰好出國開會，我用《中國時報》的電話打去香港，把每一個前後不一之處指出來，讓他了解如何修改，是否同意……。」經查陳映真年表，他在1987年6月係赴韓國首爾講學，要到1988年6月才應邀赴香港參與研討會，此處恐怕是季季記憶有誤。見季季(2015: 317-318)。

知道他人在哪裡，但他會打電話給我，叫我把哪一天的報紙找出來，找到之後還不能夠跟他長篇大論地講，要跟他簡報，他的文章就會用上這份資料，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除非你跟他有直接的工作關係，像我是他工作的班底，其他的那些朋友，像是協助《人間》的寫手，他也會請那些人幫忙寫作上的一些問題。像季季跟他的關係當然是很深刻，而且她也很能寫，所以幫了大陳很多的忙。至於其他人幫的忙，我就只是聽說而已，沒有真的見過。

大陳自己做事情是不大愛麻煩人。可是創辦《人間》是個很大的事，你看它的創刊號列出大陳的編輯顧問，⁶⁵基本上是網羅了台灣攝影界頂尖的人，而且沒什麼意識形態，左中右都有，這是大陳的高度。雖然他要培養的是比較批判性的報告攝影的班底，可是他還是有他美學上的寬闊。很多人願意幫大陳，他在這方面也能夠兼容並蓄，不過他的寫作、論戰仍是由他主導。他也算是很有心的一個人，周邊誰有哪一方面的專長，比方說以前他需要經濟的數字，他就會打給簡永松說：⁶⁶你幫我找某一方面的資料。很多東西你看他做得很紮實的，其實是很多朋友幫忙。他跟漁父論戰也是，不然他一個人要讀那麼多，什麼依賴理論，這不大可能。⁶⁷

陳映真對我的信任或者是放任是，後來在他去韓國的時候，⁶⁸整個《人間》的事務就交給了我。我們的印刷原來都是沈氏在印，他們是最高品質的印刷廠，可是我還不大會看照片的品質，沈氏老是拖，秋雨

65 根據《人間》雜誌創刊號的紀錄，該刊編輯顧問包含：高信疆、詹宏志、蔣勳、林懷民、吳靜吉、黃春明、郭楓、尉天聰、王禎和、張照堂、阮義忠、蘇俊郎、關曉榮、吳嘉寶、林俊義、王鑫、徐國士、韓韓、馬以工、梁正居等二十人。

66 簡永松(1947-2019)，嘉義民雄人，曾於1970年因故入獄，因求職艱難遂自行創業，包含1981年創辦聯雅科技公司、聯盛機電工業，以及喬美國際網路、喬安網路平台公司等。見喬安互助網(無日期)。

67 漁父與殷惠敏皆是旅美港籍評論家楊誠的筆名。這場論戰的內容主要環繞著陳映真的「華盛頓大廈系列」中篇小說〈雲〉所展開。論戰內容可分別參閱：漁父(1986)、陳映真(1988)。

68 於范振國擔任執行編輯期間(第14至24期)，由秋雨印刷之期數為第22至24期。

的老闆又來找我，一氣之下就換了印刷廠。我不知道這個其實是犯了大錯誤。秋雨拿來的封面沒有辦法印出有層次的黑白，我編的那幾期，照片的印刷品質是真差。那時候不會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但事實上第一個是，沈氏義務地支持了陳映真，等於是「道相挺」，印得這麼精美，以它的收費標準來說是非常低的，我忽然間說把這份情意給斷了，沒打報告、沒交代就自己做了決定。第二，秋雨又印得那麼爛，回來陳映真都沒講話，看一看，他私底下大概費了很多的力氣，又再換回沈氏，卻從來沒有責備過我。等到混得夠久，我會看照片的時候，想起來才覺得：大陳對我真的是……。你看他的人格、他怎麼帶你，你說，還有什麼東西比這樣的教育更刻骨銘心？

反李長榮、反五輕

水源里那一期是我編的，封面是蔡明德拍的，報導是林美娜寫的。⁶⁹我之所以下去，最主要是因為參與了反杜邦運動——在環境運動上，因為它高度的知名度，它的成功也很鼓舞人心，我們這些參與者所學習到的經驗，在台灣社會是可以提供的，我也參與了很多後來的環境運動，就像關西的徐蘭香她們，或是後勁、水源里，我也是用反杜邦運動的模式介入。

台灣的環境運動最早其實是反三晃，那是因為陳秀賢進去做的緣故，他當時就已經是社會運動的一把好手。反杜邦剛開始發展的時候，反三晃已經進入了一個階段，我們因為反杜邦才跟陳秀賢認得，陳秀賢也就帶著我們去搞反三晃運動。反三晃的時候《人間》還在籌備，所以沒有報導，那時候陳映真去演講，就講國際的污染輸出。⁷⁰所

69 見蔡明德等(1987)。

70 根據綠色小組社會運動紀錄片資料庫的紀錄，陳映真出席與反三晃相關的會議為1986年4月27日台中縣公害防治協會的成立大會(影片編號0011-01，索引片段10)。

以，就環境運動的順序上來講，其實反三晃是開路先鋒：參與了反三晃運動之後，陳映真認得我們；但真正跟他有比較多接觸，就是反杜邦。

我們參與這些運動，其實也沒那麼複雜。一剛開始的時候，就是講一些環境、公害的知識與常識，談我們在法令保護上的薄弱，也需要居民的自力救濟，大概是做這些群眾的宣傳或是解說，然後組織。像是水源里的自救會，我們也是協助做這些工作。雜誌有雜誌的任務，陳映真會派記者下去，像蔡明德他們實際上沒有跟我們和群眾搞東搞西的。

最開始為什麼到水源里去？其實很早之前有個新竹化工的污染，泛夏潮系在環境運動開始的時候有一份雜誌叫《生活與環境》，⁷¹是黃順興、蔡仁堅他們編的，是因為蔡仁堅的關係介紹，我們才知道這件事的。那時候楊渡是《中國時報》下去採訪的記者，搞社會運動小組的，我們跟他在大學時期因為文藝青年的瞎混就認得了。我們一起搞反杜邦的時候，楊渡的角色是謀士、謀略，實際上要跟群眾講話、做幻燈片的解說或是廟口的宣講，都是我們來幹，他就負責寫。他要去新竹化工的時候，找上我一起去，看能不能把新竹化工的污染做個報導，然後把運動搞起來。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我才接觸到李長榮水源里，那一邊也有很嚴重的污染，我們就開始去。⁷²

新竹化工跟水源里其實蠻近的。⁷³我們派了一整個團隊進去：蔡明德去拍照，林美娜去寫稿，綠色小組的麻子去錄影，⁷⁴我們去夏潮系

71 《生活與環境》係於1981年10月創刊，發行人為黃溪南，社長為黃順興。後於1982年停刊。

72 亦可參考李長榮化工抗爭聲援者黃提源教授的回憶：「在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成立之前，鹿港居民因為反杜邦於1986年10月先成立『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雖然杜邦生產的是更具毒性的化學物，但還沒有設廠；新竹的李長榮化工則是既有的污染，居民已深受其害，不過，因為兩地同樣在進行環保抗爭，算是『同命』，所以也互相聲援。當然，他們有更多反抗的經驗，幾次前來給予支持。」見許瑞浩等（2023：176-180）。

73 經查網路黃頁資料，新竹化工舊址位於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二段469號，李長榮化工新竹廠舊址則位於新竹市東區水源里千甲路131號，兩地距離約僅一公里。

74 根據綠色小組社會運動紀錄片資料庫的紀錄，綠色小組進駐該地期間為1987年4月

黃溪南開的「多看一眼」那邊住：⁷⁵那是間賣服飾的量販店，他其實是黃順興身邊很重要的幕僚，放手讓我們這些後輩搞運動，衣食膳宿跟酒都不斷地提供給我們。

我感覺鹿港跟水源里沒有很明顯的差異，也沒有觀察到閩南區或客家區在行動上的差別。相同的反而是：我們鄉村裡青年的流失跟空洞化，讓上場「打仗」的都是老人家。其實反杜邦上街頭的也都是老人家，他們在地也很少年輕人上街。第一是，他們要保護年輕人，這有種為後代擋一點危險的那種老人家的犧牲；水源里也是這樣子，都是老歐巴桑上街。她們不像我們現在年輕人上街的激昂、激烈，就在那邊做手工、把廠圍起來，就是很日常。你說它溫和，但是它的力道其實很強。說實在的，反三晃、反杜邦、水源里、後勁跟關西正農藥廠幾個比較有名的案子，都是我們這一批人搞的，樣態和模式基本上就是我們的風格，差距不大。受害的群眾因為有外地人去關心，他們會受到很大的激勵，會覺得連外地人都這麼關心我們。

我們去水源里之前，也沒有很刻意地打點些什麼。因為我們搞過運動，介紹我們的蔡仁堅又是知名的政治人物，他在地方上的形象也非常好，也比較容易取得信任。在草根運動裡的頭人或領導，大概都會跟民眾發生聯繫，像在鹿港，我們也是主動去找李棟樑，沒有特別地去安排介紹，就很自然透過人的關係。那個時候你搞哪一個領域都會有一些人，透過這樣才會找上門來、我們才會去到那個地方，進入到他在那邊既定的關係網絡裏頭。

後來的反五輕，是當時的核心幹部蔡朝鵬他們四、五個人來找王拓，請他來聲援。他們之所以對王拓有印象，是因為他是美麗島事件的

至1988年7月期間，尤以1987年較為密集，後續並製成「在沒有政府的日子裡」(編號24)、「水源里與李長榮的抗爭」(編號35)等兩支剪輯片。

75 經查商工登記系統，由黃溪南設立之多看一眼商行，登記地址為新竹市北區中央里西大路430號，設立時間1987年8月25日。

人，又知道王拓是《人間》雜誌的，《人間》雜誌又報導過反杜邦運動，這跟他們的環境被破壞是一樣的。他們離開以後，大陳跟王拓就找我，要我下去協助一下，第一趟我去了七、八天，一起下去的有做文字的陳啟斌，鐘俊陞則是負責攝影。在後勁那個地方，蔡朝鵬、劉永鈴他們都是開店的，蔡開的是一間蠻不錯的大茶館，他們還幫我租了一個小房間。我們那時候寫的報告被大陳說是寫得不好，但還是登了。⁷⁶

我在五輕主要是負責做組織：就是把核心幹部找起來，用我們鹿港反杜邦的經驗，拿幻燈片來講台灣環境運動的歷史、或是看 Eugene Smith (尤金·史密斯) 的照片。我沒事就跟他們聚在一起，他們會帶我們四處看看。我去的時候，他們需要寫文宣的人手，我實際能夠貢獻的力氣大概就是寫文宣了。平常我會關在房間寫他們內部的宣傳文宣，如果晚上有空，也會跟幾個幹部聚在一起，講要怎麼組織、怎麼成立公害防治協會這類草根社團，陪著他們四處去拜訪人，其他人就是負責報告攝影跟紀錄。

那時有兩個事情同時在進行：我那時候都在搞後勁反五輕，另一邊是也在高雄辦的勞工夏令營。勞工夏令營就像嘉年華一樣，柯正隆、苗栗那些人都一起來吃粢粑(cí ba)。雖然我也有去參加夏令營，還是被批評了一下。大家講說，我都不好好搞勞工運動，在新竹搞農運，下高雄又是弄這些環運。他們的認識就是如此。說實在的，我們工作的人手都不夠，你一定是什麼事情都不能那麼專業地只搞一個部門。在後勁的時候，王義雄他們那邊的勞工服務也做了起來，他是學法律的、有那個淵源，我們跟他們的辦公室主任也有互動，後來在工黨裡他也算是蠻重要的一個人。

《人間》是很受好評又非常響亮的招牌，很多人都被認為是以《人間》的特約身份來去搞社區工作，像我跟盧思岳就是。在那樣的一個時

76 見鍾俊陞等(1987)。

期，你去到當地，老百姓可能會懷疑，人家會認為你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不會說你怎麼這麼有認識、有正義感，好好的老師不幹來這邊，就是先存這個疑慮。這也是難免的，那時還是在整個老K（按：指國民黨）的體制之下。

因為《人間》雜誌報導過反杜邦的事情，會到現場參與抗爭的人，大概都比較關心這一方面的新聞，他們模糊的印象，大概都知道我們跟綠色小組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你看《人間》雜誌的報導，我們哪一場運動不在？哪一場都是我們這批人，這不是要搶歷史的貢獻，確實是如此，《人間》雜誌上有各方面的運動，到處都是我們的人。但你具體是哪一本雜誌的記者，包括陳映真是誰，他也不會認識。比較能取得他們信任的是：我們這份雜誌是真正做過這樣的報導；我們也不像一般的記者，一直問東問西然後就走人，也會幫忙做些什麼。

現在想起來，陳映真找我去的時候根本不是叫我去做編輯，他就是希望《人間》裡面有個搞組織工作的人。他有拿一些草根運動的綱要或手寫稿來給我看，叫我要讀一些草根、群眾運動的書。陳映真整個的想法，也不是要辦一份拿得到金鼎獎的雜誌，去《人間》的大概也都是帶著這種意識的人。為什麼說「我是《人間》的」？其實我們就是領陳映真薪水的，大家也就是跟《人間》雜誌一個脈絡，拿筆的、拍照的，只是陳映真沒辦法付太多的薪水給你。有些人的寫作風格、政治立場跟認識不一樣，但是那個時候在搞社會運動、反國民黨，在這個共識上其實蠻普遍的。

我一直認為《人間》雜誌本來就是一個變革運動的媒介而已，不應該用「經典的報告文學」來認識他。當然這是一部分，你看他報導了農運、工運，當然不只是做報導，因為你涉入得很深，群眾對你有所信任，你的報導也比人家更深，你也成為了其中的一員。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所以大陳才講：「運動搞起來是最重要的。」

工黨與勞工服務中心

大概是1987年尾要籌組工黨之前，陳映真有段時間不在台灣，出差去了韓國做報導，他把雜誌社的工作交給我跟王菲林兩個人負責，我們就負責編了一段時間，自作主張地。那段陳映真不在的期間，很多朋友開始有各種議論，傳遞消息說我們要組工黨了，那時候我不知道是要跟誰組。菲林跟所謂的「拉派」，⁷⁷還有蘇慶黎在美國的因緣，以及林華洲跟《前方》的這些朋友，以前都是在人間雜誌社進進出出的這些人，大家都會有這些講法。陳映真沒有回來之前，我陸陸續續參加過幾次他們非正式的會議，或者是閒聊組黨的事情；陳映真回來之後，菲林說要陳大哥表態，要他入黨號召，我不知道陳映真怎麼跟菲林談他的態度，但隔沒多久他就跟我講說，要我把編輯檯的工作先整理好，交接一下，你就下去幫忙。我也不知道是要下去哪裡。

蔡建仁他們其實在美國的時候，就已經每天都在談工黨的事情了。我原來都不大知道，原來左翼的內部有這麼多細微的分歧。後來一路地看他們籌組工黨，大家都講像是密碼的話。離開《人間》以前，我就已經常常去杜繼平的《海峽》那邊，草擬跟討論工黨的黨綱。其中，總綱是蔡建仁寫的，他剛回來台灣，因為缺乏這種經驗的土壤，看到《夏潮》的存在當然是眼睛一亮，產生了很多的想法。

蔡建仁除了親自地寫作黨綱外，還把他在美國LA的這些人全部找出來，每一個人都分派工作，他講說：「我們平常就是在鍛鍊這個，現在我們寫的綱領不是寫文章，就是我們執政之後要幹的事情。」像寫文化綱領，就是要用身為一個文化部長的格局去寫。在那個時候，蔡建

77 拉派，又稱為LA派，LA為洛杉磯(Los Angeles)的縮寫，指的是在八零年代以降赴美國留學期間，受保釣左翼團體及其機關刊物《台灣思潮》所影響的歸國學人。當時就讀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影系的王菲林(王介安)，因為同學井迎瑞的介紹，認識了拉派成員蔡建仁，從而加入了這個非正式的組織網絡。見鄭鴻生(2012)、吳永毅(2014: 157)、井迎瑞(2020)。

仁對我來講根本是另外一個世界。或者是寫空間綱領的時候，他去找了鄭村棋、夏鑄九這些人，他們跟杜繼平、老汪談到不知道哪邊去，講一些那麼深的理論。我根本就搞不清楚也不認識他們是幹嘛的，程度根本連幼稚園都算不上。弄完之後，還得辦巡迴講座，一方面宣傳、一方面組織。LA他們這些人就在講，真的要這樣子曝光嗎？可是小蔡還是覺得要做。在那個現場裡頭，我印象比較深的是黃文淵說，要有客家人的綱領。那時候他的客家意識很強，而且也是所謂的客家運動方興未艾的時候。黃文淵是亞泥的工人，我跟他是先一起搞工黨，他的工會鬥爭我們也下去聲援。

工黨要開始搞的時候在耕莘文教院辦了成立大會。同時，陳秀賢也說他要弄一個社會運動工作室，要下去搞農運，問我要不要去。⁷⁸ 那時候蔡建仁跟陳秀賢已經開始在搞農盟的事情，就是各地搞農權會、各地巡迴演講，他們當然是因為閩南語都很好，但是客家話他們不行。陳秀賢根本就沒辦法講國語，他的演講會打很大的折扣，他的風采完全沒有。因為大陳叫我協助籌組工黨，所以我拒絕了他。

蔡建仁剛回來的時候還有一點點的忌諱，他不敢太露，新竹這個地方就交給我們，他們帶林正修這些台大學生來，到我們那邊睡。相對於羅美文跟他們在語言、認識會有一些距離，我跟他們拉得比較近，因為跟小蔡、秀賢有工黨的脈絡，秀賢甚至還有鹿港的經驗，根本就是同志，不言而喻。我們做知識人比較有一點點優勢，能夠奉獻的是我們能夠組織我們的文字成文宣。小蔡跟秀賢大概覺得，很難得看到怎麼一個好好的高中老師不幹，來跟他們這些人搞在一起，沒日沒夜的，叫了就走，又去幫他們寫文宣，跟他們一起吃喝睡。我當然

78 工黨於1987年11月1日正式成立；社運工作室則無明確的成立時間，據其成員林正慧、黃志翔回憶，約略是在1988年1月的「賤賣果農行動」後方告成立。見聯合報（1987年11月1日），林麗雲和陳瑩恩（2018：8-9），陳光興、林麗雲、郭佳（2019：24-33）。

就完全取得他們信任，我想的卻是他們這種草根裡頭的人，怎麼認識這麼清楚。彼此之間不知不覺就會建立那種親如兄弟的信任。

黨建成之後，我被分派到工黨的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在那邊做類似總幹事這種職位，開始比較實際地跟工人接觸。勞工服務中心主要的工作，其實就是在幫忙組工會，或者是說有勞資爭議的時候，我們去站在勞工的立場。我們都帶著勞基法，查到說調職要符合五個條件，⁷⁹就可以跟資方講。台灣的工人根本不太知道資料或法律依據在哪邊，我們又會找資料、又不是他工廠的人，跟他們那些主管可以說話。我們又有媒體關係，或我們自己會寫稿，有些地方記者沒新聞好寫，我們寫的傳單就被他們當作文宣直接照抄，當然會對勞工有幫助。

會來參加工黨的工人，像羅美文他們，我們的這些關係都是來自羅美文。他在桃竹苗其實搞了很久，因為我們是工黨的黨工，所以就會受邀去工會、去工人家裡的喜慶婚喪或大拜拜，去了就介紹我們是誰，主要互動的都是羅美文的脈絡。後來自動找上門，就不是羅美文帶來的了。至於那個時候來黨部的學生，就是來參加「生活體驗營」的，我們就是幹活，帶他們去跟人家認得。

我認得的所有工人，既不會什麼組織群眾，也不會講工人意識。這些工會頭頭裡，生活比我糜爛、比我過得好的多的是，我跟他們混的時候，從來都沒有說我們這些知識份子「臭老九」就能怎麼樣。工會都是一個人，所有都是幫派型的，都是叫大哥的，沒有什麼理事長不理事長，我認識的工會頭子，跟我莫逆之交的都是這一些跟我一起吃飯喝酒的。⁸⁰他們只知道我是老師，我跟他們見面會講一些我自己知道

79 根據1985年9月5日內政部(七四)台內勞字第3428433號函規定：「〔……〕如雇主確有調動勞工工作必要，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三)對勞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四)調動後工作與原有工作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所可勝任；(五)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80 類似的觀點曾在九零年代相當風行，如趙剛強調家庭主義與非正式社會網絡對於工

的理論，怎麼去認識這個社會、這個世界，他們聽了也覺得蠻有趣的。羅美文以前三更半夜會跑來我家，讓我對我家裡人很抱歉。他們想來就來，喝了酒，有時候凌晨就來，他就是要來跟你聊天，講一些工廠裡頭的瑣事。我跟他們的感情都很深，但是憑良心講，要說他們這些工人是不是在搞我們在書上讀的、想像中的那種鬥爭？他們的進步空間實在很大。例如，環境運動跟工人運動本來應該是合在一起的，但是遠化的工人不大會關心他廠外的環境污染，工人的認識其實是很有限的，我們去那邊只是關心他廠區的工業安全衛生，你要他們監督遠化排廢水，他們不會很帶勁的。

在勞服中心印象比較深的事情，一個是華夏玻璃工人陳建佳，他們組織工會的三個幹部被開除、來申訴，我們幫他寫傳單、搞抗爭，也辦了解嚴後第一次工人的遊行，⁸¹其他就是年終獎金的抗爭。實際上跟工人的接觸很多，我們如果比工人多一點長處的話，那就是我們有比較好的文字組織能力，可以幫他寫點東西，工人因為這樣子對你也會有特別的好感。在那邊我交了幾個很好的勞工朋友，也協助他們選舉，我還幫石油工會的李驥羣寫傳單選石油工會代表，我喜歡寫打油詩，也幫他寫了幾首。他很喜歡從籤詩裡看號碼來簽大家樂，所以他非常興奮，我也因此跟他成為很好的朋友。我也協助新竹農權會跟農盟系統的農權會，寫了幾份很好的戰鬥文宣。但是，農盟跟農權總會的鬥爭我沒有介入，⁸²那時候我還在工黨，而其實工黨也準備要分裂了。

運抗爭的影響，或是陳政亮探討在資本主義之前形成的「父權／兄弟關係」如何影響工運組織。見趙剛(1996)、陳政亮(1996)。

81 該場遊行在1988年4月28日舉行，主題為「抗議華夏玻璃公司非法解僱勞工及新竹市政府濫權失職阻擾工會成立」，是因為陳建佳、胡榮泰、林貴春等三人籌組工會而遭公司以不當勞動行為對待後開除所引爆。遊行從新竹公園麗池旁馬路(即陳建佳住處)出發，前往華夏玻璃董事長廖福地住處，再轉往新竹市政府、華夏玻璃公司抗議。見聯合報(1988年4月28日)、聯合報(1988年4月29日)。

82 1988年6至7月間，台灣農權總會由南部稻農、雲林農權會與親新潮流人士成立，中部丘陵果農、山城農權會與夏潮系統則成立台灣農民聯盟。

當我在勞服中心做勞工服務時，老同學是在背後支持。在台中，盧思岳他們背後也有一批老同學，我們在新竹當然就是劉建修「劉桑」。這一批老同學在他們封閉的圈子裡頭，很少碰到所謂的知識階層，或是有正當文教工作的這些人，又可以跟地方上民間群眾瞎攪和。他們對我跟盧思岳非常地好奇，透過陳秀賢的淵源，我們才這樣地因緣際會而認得了他們。大概是因為我跟群眾可以這麼相處，老同學一方面因為年紀，一方面因為政治的忌諱，他們也不再怕人家說他們在搞組織，像我這種比較單純的，讓他們覺得說可以交付一點工作。當時羅美文還對我很批判，說我都不務正業，工人事務都不大搞，愛熱鬧，又搞學生又去農運，他那时候認識就是如此。

其實老同學跟我們《人間》兩邊是有很多的交集。台灣左翼的歷史，大概有兩股力量，就是老同學這一脈絡，跟蔡建仁他們這些留美派，之間是怎麼樣的糾纏，怎麼樣的共同推動，又走向分歧。對我來講，一直是這兩股擰在一起的力量拉扯不清，台灣的整個大的局勢起不來，跟這個很有關連。

蔡建仁他們覺得，那個年代的我們曾經有一段很長的大好時光，革命的曙光已經出現了。《夏潮》一直很努力想要成為一個政治組織，而他很早之前就想要自己搞，但是社會條件也不夠。在那時候的社會裡，老同學雖然很難跨得出去，但是心理上想要往政治組織走去，搞了夏潮聯合會，所以才有紀念台灣民眾黨的行動，他們就講「六十年前大家就組黨」。⁸³

83 該場「台灣民眾黨創黨六十週年紀念」活動，是於1987年7月10日在金華國中禮堂舉辦。其主要內容除演講外，尚包含由人間劇團演出的報告劇「台灣民眾黨六十週年歷史證言」。見韓嘉玲(2018)。

對綠色小組的回憶

綠色小組是從許信良的桃園機場事件起來的，正式成立工作室、成為小組，其實是在德惠街。在阿官、蔡明德去採訪的時候，問說他們有沒有一個名字啊，他們就說是「綠色小組」。那時候是green peace最興盛的時候，所以跟民進黨的綠色八竿子沒關係。其實他們跟《人間》的我們，都是同樣的關切點，他們特別關注環境運動、原住民運動。那時候的林美娜已經是自立的大記者，但綠色小組有誰知道啊。《人間》和綠色配合的比較好的，就是救援湯英伸，還有賴春標的森林砍伐。不然綠色就是走他們自己的紀錄運動。他們特別在政治上介入得比較多，《人間》雜誌反而比較少去參加。應該這麼說：《人間》有涉入的這些社會運動或是當時的民主化運動，基本上綠色小組都有；但綠色小組有的，《人間》雜誌不見得去參加。綠色小組基本上什麼都紀錄的，很多談台灣建國之類的，《人間》不可能去。大陳不大可能用他的篇幅去做這些。

綠色小組在人的關係上，基本是跟《人間》重疊很多。但他們有他們的想法，從一開始，他們的想法就跟《人間》是不一樣的。他們真的是比較本土意識的，儘管當時沒有那麼明顯，最明顯的就是鄭文堂。我去找他們的時候，綠色小組還只有四個人：三沖、傅島、麻子、信誼。我去是為了找他們入黨，他們覺得說，工作要分配一下，所以信誼跟傅島有入工黨，麻子跟三沖入民進黨。

鄭文堂我不知道他原先怎樣，反正我們就是夏潮系統，後來就也不參與了。沒有什麼交惡啦，是後來才知道他就是這樣。工黨分裂之後我們組了勞動黨，籌備時我是負責組織的部門，我記得鄭文堂還揶揄了我一下，「這麼年輕就扛組織部啊。」他是好意勸我呢？還是什麼，我聽不大懂。比起《人間》，後來綠色是先宣布結束，王菲林跟很多人去了德惠街開會，勸他們說不要這麼樣地散掉，還繼續可以做紀

錄、做二十四小時的新聞播報。但最後其實就是職業倦怠、運動傷害，所有人都已經很疲倦了。

工運高峰：遠化罷工

當我到現場的時候，遠化罷工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我記得我還在東海念哲研所，因為我還有跟盧思岳講。遠化後來持續抗爭，我們大概有介入，但是沒有很深，我們最集中參與的就是搖鐵門那一次。我有跟盧思岳講，我們要讓運動流血，大概只有這樣，這場才有希望。後來有比較多激烈的做法。其他在很多的的地方跟工人開會、討論策略，我當然也常去，但是印象沒那麼深。

鄭南榕那些自焚的事件，對我們的衝擊蠻大的，像永毅的心情也是。就是那種激烈的行為，對投身運動的人，像我們去後勁，看到鄭懷仁他們理光頭、抱著汽油桶或是抬著棺材，那個根本不是作秀，他們就是準備這樣子做，他們覺得鄭南榕就是典範。當然大陳知道這個路徑，但對我們來講，內部會有很多的批判。這樣做的衝擊是在情感上，搞運動的人總是覺得這種犧牲是讓人敬佩的，事後當然會有很多的解釋，說這個人如何，但在一開始的時候，跟國民黨的威權鬥爭，他可以這個樣子，那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衝擊。我們碰到很多草根的人，他們基本上就是覺得鄭南榕立了典範，他們根本就不怕你了。

基本上這一些人投入運動，整個社會運動的進程走到那個地方，還是受到權力的壓制，難免運動的內部會分化重重，內部會有很大的壓力，最後當然就會採取很激烈的手法，不惜犧牲。犧牲最明顯、立下了一個模型的，就是鄭南榕。人都走了，那一些人特別是以草根的情感為主的，不講認識的，是有很大的刺激跟推進的作用。

對我們來講，我們也會想說：如果我們一直是用現在的方式走，是不是在運動的推進上會有很大的限制？是不是也應該要有某一種這

方面的行動？比方說在遠化罷工的時候說要絕食，徐正焜就講說，不需要走到這麼激烈的這一步吧？勞資的鬥爭，不需要走到用生命相搏吧？他在開會的時候是很理智的，你在那種群情激奮的時候，徐正焜那種理性的聲音，也因為是他在遠化一向有讓人信任的軍師的地位，⁸⁴要不然一般的人怎麼可能？像鄭南榕那種事情，對運動都會往激烈的方向推進，到最終就是，了不起你以性命相搏。結果，後來整個運動也陷入低潮，幾次的鎮壓之後，運動的群眾跟幹部也都會退縮。

遠化罷工的時候，李文忠、蕭裕正他們也來了，跟我們一起坐在群眾裡頭。苦工都我們在幹的，他們來就是要介入。他們那時也已經比較敢講自己是所謂的獨派，但是遠化一方面是羅美文的派系，然後跟我們這些人的關係、情感都比較深，遠化鬥爭的時候大概都是我們這批夏潮系的人主抓這個運動，不然新潮流他們很早之前就讓楊碧川他們都下來新埔做工作了。在罷工現場，李文忠還跟我說他們有個讀書會，一個月還是多久聚會一次，一起讀幾本書，談國家理論之類的，找我跟盧思岳去，我們沒有去。他們真的很有策略，我跟盧思岳那時夏潮系的色彩並不明顯，只是想現場都已經忙成這個樣子了，哪還有時間跑去讀這些書，其實是這種態度，不是說不想去讀。

後來遠化的失敗，對我們衝擊很大。聽說郝柏村要來鎮壓，那是有多恐慌，大家就四散而逃，那現場都看不到幾個人，反而是那些女工，那些「左妹」才留了下來。我在那個現場，講到都要哭出來了，根本就是風捲殘葉。本來地上坐著滿滿的人，一聽說這件事，連李文忠他們也跑了，說有訊息才會回來。他們是最早撤退的，也可能是最早得到消息說要鎮壓的。

84 徐正焜曾為遠東化纖工會幹部，在1980年代末期密集參與工會行動，最終於1989年5月遭到解僱。其與羅美文遭到解僱的事件亦成為當時工運抗爭的最高潮。見徐正焜等(2021)。

工黨的殞落

後來跟工黨合作的王義雄，他原來是搞勞工服務的，但他們的脈絡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想說，王義雄好的地方是他是立法委員。但王義雄為什麼當選立法委員？就是因為陳秀賢下去助選，他助選的就是兩個人，張俊雄跟王義雄。⁸⁵秀賢在選舉方面的突破創舉是很多的，例如「一票給張俊雄，一票給王義雄」，他的口才、語言，或是群眾運動的經驗、手腕都很好。再加上民進黨其實很早就開始成形，從美麗島事件開始，台灣統獨的政治氛圍就已經隱然若現，他們敏感的人當然知道這個東西非鬥不可，剛好王義雄又有這樣子的意願。只是身在其中，一定會覺得這個價值取向不太一樣。

我聽人家講，王義雄來找夏潮這一些人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去籌劃要怎麼成立一個政治組織。後來就定了叫「工黨」，海外也已經先開過會。所以蘇慶黎、蔡建仁他們就全部回來台灣搞了。蘇慶黎比蔡建仁先回來，不過這部分很複雜。建黨的時候，我們根本就是客卿，前面這些我們都不知道，《人間》要我們協助建黨工作，去印文件、參加會議，一直到後來寫黨綱，我們是列席提意見，通常都做跑腿工作。我對王義雄他們根本不是很熟，他們是搞社會福利派的，跟我們夏潮是有根本上的歧異的，會分裂是早在預料之中的。不過，我們那個時候不懂，雖然比較傾向於夏潮這一部分，也是在後來的鍛鍊過程裡頭自己成長、成熟。當時的歷史情境，我們就是熱情，可以為了這種想法、認同這種想法，就可以暫時放下自己個人。

工黨分裂是很可惜。本來工黨是工人的黨，工黨分裂就是工人分裂。我在這個政治組織是很邊緣的，也不大知道他們是什麼路數，他們分裂的時候，羅美文、黃文淵他們就叫我寫文章，說工人支持勞動

85 指1986年12月6日舉行之第一屆立法委員第五次增額選舉，張俊雄、王義雄是以無黨籍身份參選高雄市區域立委。

黨。那時候《民眾日報》還在，⁸⁶記者都是很懶惰的，我們都把新聞稿寫好好的，他們會直接把我們寫的登個大半版，就說工人這樣說。

說實在，我到現在也不清楚到底為什麼分裂，只記得我們跟王義雄的搞法是不一樣的，後來又有一大批的黨員進來，或是去大橋頭底下搞了計程車司機的工會抗爭。在勞服中心工作了一段時間，因為我們投入工黨之前是屬於夏潮聯合會的系統，分裂時，我們自然就會歸屬於夏潮系主抓的勞動黨。在勞動黨也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後來我辭掉了，是黃榮賢來接替我的工作。勞動黨的工作裡頭印象比較深的是認識了徐蘭香，也知道勞動黨在基層也做了很多聲援、救助無助勞工的事情，徐蘭香就是一個例子。除了幫她取得工傷的報償之外，也幫助了她做關西的正農農藥廠抗爭。⁸⁷我也幫羅美文做了兩次的選舉，⁸⁸之後我就去中壢的復旦中學教書。後來羅美文要選舉，我又把教職辭掉，選完之後因為那時候的條件不好，我之後就與這個團隊跟組織的距離比較遠，互動就少了。

《人間》的休止

關於《人間》雜誌的結束，有兩種說法。一個是銷路不好，不是說你財務負擔不起，其實很多人願意支撐他。財務當然是一個理由，這也是陳映真停掉《人間》雜誌，不會有任何爭論的理由。問題是，他自己可以解決財務問題，但他不解決，這個關鍵在於他對這些事情的判斷：一個是社會的走向，他這個戰略他是不是應該暫停，另外一個，大概就是有人認為，是因為楊憲宏佔據那麼重要的總編輯的位置。⁸⁹

86 《民眾日報》係於2010年5月前後因經營權爭議而停刊。見公視新聞(2010)。

87 徐蘭香針對關西正農農藥廠的抗爭係於1986年開始發動，並在1992年的中毒事件後全面爆發，該廠後於1994年5月為新竹縣政府環保局勒令停工。見張家綸(2019)。

88 羅美文係於1991年參選第二屆國大代表，以及1992年參選第二屆立法委員。

89 楊憲宏係於第40至第47期(即最後一期)間擔任總編輯。

以前大陳是很看好楊憲宏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去找來的，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子的芒刺在背，雜誌要公然跟他決裂嗎？不過這是查無實證的事情，我想有很多幽微的感受，當然也有他個人的疲倦。

《人間》雜誌從那麼被看好、叫好，然後一直萎縮，其實反映了這個社會對這份雜誌的疲憊感，或者甚至是有某一種程度的蓄意地削弱，這個當然是大陳的判斷，財務問題只是表面。他一向就是把《人間》創刊當成他的戰略佈局，不光是去辦雜誌。財務問題當然是公開的，陳映真一來是不願讓他的財務跟其他人有太多的糾纏，他寧願把他自己的家、把他弟弟的工廠，這些家產拿出來，也不願意拖累別人，也不要財閥去控制他。這個是最原始也最正確的理由。不過確實，從《人間》雜誌的最後往前看，尤其是楊憲宏編的後面幾期的走向來觀察，《人間》雜誌從來沒有什麼人物，他弄了陳定南當封面，⁹⁰開始談綠色的政治佈局，大概都是楊憲宏的編輯方向。所以他編的那幾期很多編輯跟發行人的話之類的，大陳都會作出平衡，特別是六四那一期，明顯的是他跟楊憲宏之間存在分歧。⁹¹

六四這種事情跟陳映真的表態，當然讓陳映真大挫敗。這個雜誌要怎麼走下去？台灣社會怎麼樣？陳映真在六四之後沒多久去了大陸，兩岸三地的左翼都對他嗤之以鼻，香港的那些朋友都嚴厲地斥責，認為陳映真怎麼墮落到這個程度？而且他是以統盟主席的身份帶團去的，等於是公開介入了政治。對他而言，以這樣的身份去介入，跟《人間》要怎麼走下去，我推測兩者之間可能有很大的關係；這件事

90 指1989年2月出版之第40期，該期有陳定南的專訪與執政經驗談。見楊憲宏等（1989）、陳定南等（1989）。

91 楊憲宏接掌總編輯的第40期至第44期之間，每期《人間》均有刊載「發行人的話」；第43期起同步刊載「總編輯的話」。在第44期，陳映真曾初步提出對六四學潮內裡的中國知識分子任務和角色的反省，痛感於運動對中國社會性質分析的缺位，使得其理想「單純卻毫無政治和知識實體」，反倒傷害了參與集會的學生與群眾。見陳映真等（1989）。

情會不會關聯到《人間》雜誌，他必須要思考。他常說，「《人間》是他奶大的孩子」，該要怎麼走下去？他心繫得很。

雜誌要停，也不是今天說了明天就能停，停都是要一段時間，就是那三個月的時間。兩岸剛開的時候，他叫鍾俊陞去做大陸的採訪，去看中國大陸怎麼樣。⁹²台獨派後來甚至批評《人間》：台灣的專題就做得黑漆漆的，中國大陸跟匪幫就做得光鮮亮麗。大陳當然知道，那時候徐璐跟李永得他們都還沒去，⁹³他對於中國大陸的報導跟開放抱持興趣，這就是他的思路跟佈局裡頭要這樣做。但這樣一來，碰到六四這個事情怎麼弄下去呢？在台灣的戰鬥，又該怎麼走下去？他心理上可能不知道怎麼跟人家講，所以他喊停。

《人間》停刊的時候，大陳就自己寫信給訂閱的讀者跟客戶，寫給曾經工作過的同仁。他可能只是停掉一下，但一直想要再起。所以是他想著要怎麼走下去，可能要停一下，調整他的步伐。《人間》確實不是停刊，他沒有寫停刊號，也沒有宣布倒閉，就是這樣沒有出了，可能是休息一段時間，他後來才會轉換成「思想創作叢刊」。⁹⁴而且他一開始講思想創作叢刊，還是有放照片，雖然不能像《人間》雜誌放報告攝影連作，那就是放單張好的照片，那就是要讓人家知道：《人間》作為攝影紀實刊物，這樣的印象還在；也真的是有復刊的準備、想法跟計畫。後來他就又病倒了，接著就是呂正惠的另外一個方向。

92 雖無法確定其抵達時間，但鍾俊陞曾於1987年10月在北京進行採訪，成果後來以「人間證言：在大陸台灣人系列」為題，在隔年10月的第36期起刊出，惟該系列似乎僅有首篇。見鍾俊陞等（1988）。

93 根據時任《自立晚報》總編輯的吳豐山表示，李永得與徐璐是在1987年9月11日前往北京進行採訪，並在同月27日返台。見吳豐山（1987）。

94 指由人間出版社出版、曾建民主編之「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書系。該系列第一輯為是以對平反皇民文學的批評與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的回顧為主軸展開，同時並刊載關曉榮的八尺門攝影與紀實報導，以及吳晟、詹澈與施善繼的散文與新詩。

參考書目

- 丁時達。2005。〈臺北市升大學文理補習班變遷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人間雜誌編輯部。1985。〈人間稿約〉。《人間》1：93。
- 中央日報。(1969年5月8日)。〈基隆中學驚人血案 學生喪失理性 用斧劈死導師〉。《中央日報》，第3版。
- 。(1969年5月27日)。〈周振隆弑師 處刑十五年〉。《中央日報》，第3版。
- 。(1978年7月29日)。〈浪子回頭金不換 搶劫判刑獄中改過苦攻讀 范振國獲得假釋考取興大〉。《中央日報》，第6版。
- 中國時報。(1985年5月29日)。〈畢業捐獻！不樂之捐？表達感恩回饋、校方從旁「暗示」〉。《中國時報》，第12版。
- 井迎瑞。2020。〈誰是「岳樂椰」？—追憶洛杉磯左翼社群朋友們〉。《人間思想》23：114-128。
- 公視新聞。2010。〈疑經營爭議 民眾日報週一起停刊〉。〈<https://www.feja.org.tw/36073>〉(上網日期：2023年3月19日)。
- 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1986。〈「杜邦設廠案」的問卷研究〉。《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綜合報告書》，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編，頁34-51。台北：牛頓出版社。
- 台北市范氏宗親會。2012。〈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崙嶺黃護寨派下字輩探討〉。〈<http://www.taipeifans.org.tw/images/pdf/8.pdf>〉(上網日期：2023年1月14日)。
- 史耘。1979。〈邁向開放的校園——中興大學「安蘭莊」事件之真相及檢討〉。《美麗島》4：113-118。
- 自立晚報。(1987年9月1日)。〈「台北人」今創刊「快樂」與您共享 王家祥封面傑作獲頒獎金二十萬〉。《自立晚報》，第2版。
- 安蘭莊書法紀念展。2022。〈安蘭莊簡介〉。〈<https://leeanzen.liyang.dev>〉(上網日期：2023年1月14日)。
- 自由時報。(2015年7月21日)。〈環亞樓起樓塌 映照政商關係〉。〈<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99720>〉(上網日期：2025年10月19日)。
- 李文吉。1985。〈我的朋友范澤開〉。《人間》2：94-107。
- 李文吉、謝又青攝影，葉根泉、謝又青、葉美雲、郭孟嬌訪問／調查，邱韻芳整理。1987。〈《新種族》：一個隨機問卷的分析報告〉。《人間》17：96-107。
- 吳介民。2016。〈1986，鹿港之夏〉。《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30週年紀念文集》，范綱塏採寫編纂，頁178-187。台北：人間出版。
- 吳文審。2007。《新竹縣湖口鄉客家族姓開拓創業史料》。新竹：新竹縣湖口鄉客家文化協會。
- 吳永毅。2014。《左工二流誌：組織生活的出櫃書寫》。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吳豐山。1987。〈人道與公理——記自立晚報採訪大陸的決策過程〉。《歷史性·大陸行》，李永得、徐璐著，頁5-9。台北：自立晚報。
- 余光中。(1977年8月20日)。〈狼來了〉。《聯合報》，第12版。
- 茅漢(王曉波)。1999。〈李登輝的民主真相 台獨法西斯下的台灣愛國主義〉。《海峽評論》105：9。
- 法務部。2019。〈歷任部長〉。<<https://www.moj.gov.tw/cp-91-44574-cabdf-001.html>> (上網日期：2020年9月6日)。
-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2018。〈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簡介〔前言〕〉。<<https://www.tpj.moj.gov.tw/364420/364422/364441/636504/>> (上網日期：2020年9月6日)。
- 林雙不。1985。《大學女生莊南安》。台北：前衛出版。
- 林麗雲、陳瑩恩訪談。2018。〈從八〇年代基層社運至今的左翼求索：林正慧訪談〉。《人間思想》18：4-29。
- 官鴻志撰文、蔡明德攝影。1986。〈親愛村報告〉。《人間》14：80-105。
- 季季。2015。《行走的樹——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增訂版。台北：印刻出版。
- 范振國。1986。〈從「我愛鹿港」到「我愛台灣」〉。《鄉情》9：41-43。
- 。2016。〈回憶那一段「陸上行舟」的歲月—為鹿港反杜邦30週年而寫〉。《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30週年紀念文集》，范綱燿採寫編纂，頁112-119。台北：人間出版。
- 范晨河(范振國)。1987。〈一個教師的愛心與信念〉。《遠望》1：49-50。
- 范鎮國(范振國)。1987。〈覺醒的心路歷程〉。《新環境》14：27-28。
- 唐文標。1976。《天國不是我們的》。台北：聯經出版。
- 徐正焜口述、張宗坤紀錄。2021。〈站上工運第一線的翩翩紳士：徐正焜訪問紀錄〉。《人間思想》26：66-94。
- 淡淡的深藍。2003。〈醒新社簡史〉。<http://v2.groups.com.tw/discuss/message.phtml?id=175727&total_tID=7&fpage=1&subject=%BF%F4%B7%AA%C0%C2%B2%A5v&session=5f549c6e777a4> (上網日期：2020年9月6日)。
- 許瑞浩訪談、林映汝記錄整理。2023。〈黃提源先生訪問紀錄〉。《臺灣環保運動訪談錄》，國史館編，頁163-192。台北：國史館。
- 張光直撰文、周孟德(陳映真)繪圖。1986。〈搶救圓山遺址〉。《人間》14：48-51。
- 張家綸。2019。〈以砂石堵廠、開花車遶鎮——1990年代新竹一場以小搏大的汙染抗爭運動〉。<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s_for_supplement/hsinchu-kansai-environmental-protection> (上網日期：2024年8月6日)。

- 張富忠。2016。〈一個黨外的視角〉。《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30週年紀念文集》，范綱塏採寫編纂，頁121-124。台北：人間出版。
- 喬安互助網。（無日期）。〈創辦人理念〉。〈<https://www.intercare.com.tw/founder/>〉（上網日期：2024年8月5日）。
- 曾淑美。2009。〈陳映真先生，以及他給我的「第一件差事」〉。《人間風景·陳映真》，封德屏主編，頁260-264。台北：文訊出版、趨勢教育基金會。
- 新竹范氏宗親會。2013。〈田心壩系范姓字輩〉。〈<https://blog.xuite.net/peter86078/blog/178976919>〉（上網日期：2023年1月14日）。
- 新竹監獄編纂。2013。《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監誌紀要》。新竹：編者自印。
- 聖約翰科技大學校史室。（無日期）。〈校史 1956～今〉。〈<https://www.sju.edu.tw/intro.aspx>〉（上網日期：2023年1月14日）。
- 楊梅鎮志編纂小組編。1990。《楊梅鎮志》。桃園：楊梅鎮公所。
- 楊憲宏撰文、李文吉攝影。1989。〈從政沒有罪惡感：一個有「政治潔癖」的縣長陳定南的故事〉。《人間》40：46-55。
- 齊益壽。1977。〈社會劇變中知識份子的徬徨——序夏丐尊文選〉。《夏潮雜誌》2（5）：24-26。
- 趙剛。1996。〈工運與民主一對遠化工會組織過程的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4：1-39。
- 蔡仁厚。2009。〈悼念王淮教授〉。《鵝湖月刊》35（4）：55-56。
- 蔡明德攝影、林美娜撰文。1987。〈還我一瓢清淨水：記水源里民與李長榮化工的抗爭〉。《人間》21：22-47。
- 漁父。1986。《憤怒的雲》。台北：允晨文化。
- 賴佩茹編著。2008。《環保弘法師：粘錫麟》。台北：綠色陣線協會。
- 興湖記事。（無日期）。〈歷屆校長〉。〈<http://archive.nchu.edu.tw/dist/principal.html>〉（上網日期：2020年8月31日）。
- 陳光興、林麗雲、郭佳訪談。2019。〈在影像視窗中思索左翼實踐：黃志翔訪談〉。《人間思想》19：4-59。
- 陳秀賢撰文，林柏樑、蔡明德攝影。1986。〈波瀾是怎樣洶湧起來的 杜邦事件大事曆〉。《人間》10：34-49。
- 陳定南撰文、李文吉攝影。1989。〈我們不要斷肢殘臂的地方自治：陳定南兩任縣長經驗談〉。《人間》40：56-61。
- 陳建忠。2007。《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台中：晨星出版。
- 陳政亮。1996。《父權／兄弟關係：自主工會運作的個案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陳映真。1988。〈「鬼影子知識分子」和「轉向症候群」——評漁父的發展理論〉。《西川滿與台灣文學》，陳映真著，頁71-120。台北：人間出版。
- 。2001。〈雲〉。《陳映真小說集4：萬商帝君》，陳映真著，頁1-123。台北：洪範出版。
- 陳映真撰文、鄭逸宇攝影。1989。〈悲傷中的悲傷：寫給大陸學潮中的愛國學生們〉。《人間》44：19-27。
- 聯合報。(1987年11月1日)。〈「工黨」今成立〉。《聯合報》，第2版。
- 。(1988年4月28日)。〈工黨在街頭表演 聲援被開除員工〉。《聯合報》，第3版。
- 。(1988年4月29日)。〈工黨遊行 聲援華夏工人 拒用飲料 便宜看熱鬧的〉。《聯合報》，第3版。
- 。(2016年12月5日)。〈施威全：30年前反杜邦 反的是無理的權威〉。《聯合報》，第5版。
- 韓嘉玲。2018。〈80年代左翼文化下的民眾劇場〉。《思想》36：1-45。
- 謝仕淵。2017。《臺灣棒球一百年(新版)》。台北：玉山社。
- 謝孟穎。2019。〈被爆50年前砍斷導師頭 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楊振隆吐露半世紀真實心聲〉。<<https://www.storm.mg/article/2015769>> (上網日期：2023年1月14日)。
- 嶺東科技大學數位校史館。2021。〈商業專科學校時期校史〉。<https://ltu-history.video.ltu.edu.tw/#109_13> (上網日期：2023年3月19日)。
- 簡嬪、井迎瑞、吳其諺、紀欣、鄭鴻生主編。1993。《一曲未完電影夢：王菲林紀念文集》。台北：克寧出版。
- 鄭鴻生。2012。〈解嚴之前的海外台灣左派初探〉。《人間思想》1：8-48。
- 鍾俊陞攝影、陸杰筆記整理。1988。〈望鄉遊子〉。《人間》36：137-140。
- 鍾俊陞攝影、陳啟斌撰文。1987。〈糟蹋了我們40年的好隣居〉。《人間》23：14-24。
- 鍾喬。2012。〈也是革命者的鐵屋——在吳耀忠回顧展的聯想〉。<<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225>> (上網日期：2020年9月23日)。